

单位代码	10445
学号	2012021151
分类号	K820.9
研究生类别	全日制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明代沂山信仰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史

申请人姓名 郭明明

指导老师 燕生东 教授

论文提交时间 2015 年 5 月 25 日

目录

中文摘要.....	1
Abstract.....	3
绪论.....	5
一、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5
二、 论文研究背景.....	6
1、 东镇沂山相关研究.....	6
2、 其余镇山相关研究.....	8
三、 论文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8
第一章 沂山信仰综述.....	10
一、 沂山概况.....	10
二、 古代沂山信仰综述.....	12
1、 四镇时期的沂山信仰.....	12
2、 转型时期的东镇沂山信仰.....	14
3、 五镇时期的东镇沂山信仰.....	17
小结.....	19
第二章 明代东镇沂山信仰的政治化.....	21
一、 明代东镇沂山之神的册封.....	21
二、 明代东镇沂山信仰景观.....	23
1、 东镇庙的建立.....	23
2、 明代东镇庙.....	24
3、 东镇庙碑林.....	29
三、 明代沂山信仰的官方祭祀.....	30

1、中央致祭.....	30
2、有司春秋致祭.....	36
3、地方官员自发祭祀.....	37
小结.....	41
第三章 明代沂山信仰的地方化.....	42
一、民间力量对国家镇山祭祀的渗透.....	42
1、民间资本对镇山祭祀的渗透.....	42
2、地方知识分子对镇山祭祀的渗透.....	43
二、沂山神灵消灾解难的传说.....	43
三、大量东镇行祠的出现.....	45
四、东镇庙会的兴盛.....	47
小结.....	48
第四章 明代沂山信仰与其他信仰之关系.....	49
一、明代沂山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49
1、明代之前道教在沂山的发展.....	49
2、明代沂山道教的发展.....	50
二、明代沂山信仰与佛教之关系.....	53
小结.....	55
第五章 明代沂山信仰对后世的影响.....	56
结语.....	59
参考文献.....	61
致谢.....	64

中文摘要

沂山位于沂蒙山北部，是齐鲁地区泰沂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五镇之首，沂山是与东岳之首——泰山并称的名山，自古就受到帝王重视，其祭祀礼仪在国家祭礼里属中祀。东镇沂山信仰最初是远古山川崇拜的产物，其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明朱元璋建国后，将东镇沂山信仰神化，官方祭祀和民间传播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文通过梳理地方志以及碑刻等历史资料，从历时性、共时性等多重视角入手，将沂山纳入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探讨明代沂山信仰的建构过程和主要特色，综合考证了明代沂山的信仰状况。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首先是关于本文选题的原因，然后介绍了目前关于东镇沂山信仰以及其它镇山的相关研究状况，最后呈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第一章主要讲述沂山的自然地理环境，然后从官方信仰的角度对封建王朝历代的沂山信仰做一个总体的描述。

第二章以碑刻和方志为主要资料探讨明代国家对沂山的祭祀，即描述明代沂山信仰的政治化特征。由国家对沂山神的祭祀来看，东镇沂山之神首先是功能之神。它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媒介。基于战争、自然灾害或者祈福等原因，皇家赞美沂山之神，这种取悦是极具目的性的，显示出皇权对神的控制。而沂山神作为仪式之神时，对东镇沂山神的祭祀则宣告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凸显皇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第三章侧重明代东镇沂山信仰的民间化过程，明代沂山信仰主要由国家牵头，民众信仰为辅。于民间，由于国家控制淫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沂山神信仰在民间的传播，但是透过一系列的民间传说、东镇行祠的建立以及有关东镇庙会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出其在民间的广泛传播状况。

第四章介绍明代沂山的其它重要信仰，除沂山神信仰之外，明代沂山还有其它信仰存在，其中尤为以道教信仰与沂山神信仰密不可分。道家信仰不仅使得沂山神人物化进入神殿，更一直掌控者东镇庙的管理事务，对于东镇沂山信仰在国家祭祀中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五章着重分析了明代沂山信仰对后世的影响。

结语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明代沂山信仰的发展状况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讨论和总结。基于前面几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基于国家权力主导，民间力量参与和佛道两

教的影响，明代沂山信仰才能够不断地融合、选择、改进，成为人文底蕴丰厚的历史名山。

关键词：明代沂山 官方信仰 民间信仰

Abstract

Mountain Yi is a place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Besides its beautiful scenery, Mountain Yi is also well known not for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feudal dynasty, many Emperors who had offered sacrifices to Yi Shan Shen. Benefit from the attention of the Royal Family, local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began to worship Mountain Yi. Therefore, from leaders to the ordinary people, sacrificing mountain Yi meant a Ceremony for family reunions and national celebration.

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time in Chinese feudal dynasty. Its sacrifice entered a new stage, both the official and folk worship were very representative. In this article, by carding stone stales and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made a interpretation of mountain Yi belief condi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paper has seven parts described as follows:

Introduction part describ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this research methods.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 of mountain Yi faith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feudal dynasty.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mountain Yi faith from the official perspective in Ming Dynasty. For the state this belief Can be divided into function and ritual parts. From the function point, mountain Yi is the medium for the emperor to communicate with god. They ask god to solve some problems,such as war, natural disaster,etc. As a ceremony,it shows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local, highlights the legitimacy of imperial power.

The third chapter i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of mountain Yi faith among the folks. The mountain Yi b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mainly is led by the state, and popular religion is complementary. In the folk, due to the national control of mountain Yi belief,the development of this belief is limited, but through a series of folk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Dong Zhen temples, and records about the Dong Zhen temple fairs, we can see that the mountain Yi belief spreads quickly.

Chapter IV perspective from the text to explore the other faiths in mountain Yi area.

The fifth chapt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mountain Yi faith of Ming dynasty on the following times.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that the mountain Yi b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mainly is led by the state, and popular religion is complementary. Therefore,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interpretation mountain Yi faith of the

Ming dynasty is meaningful, it can show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it i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to politics of the Ming dynasty. What's more, it can provide insightful information for the Lu Zhong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Mountain Yi belief in Ming dynasty, the state religion, the folk religion

绪论

一、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山东地区不仅有五岳之尊的泰山，还有五镇之首的沂山。学者多关注泰岳文化，而对沂山文化研究较少。东镇沂山是一座历史名山，为五镇之首，钟灵毓秀，巍峨险峻，有“海东第一仙山”之称。古往今来，历代帝王对沂山加封告祭，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普通民众朝山进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沂山文化，而在沂山文化中，沂山信仰占据着重要地位。

沂山信仰属于镇山信仰的范畴，是山岳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山岳信仰国家化的过程中被逐步纳入到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体系。而其自身也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镇山信仰格局。沂山作为五镇之首，对其信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完善山川信仰研究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加深对传统山岳信仰认识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补充区域文化研究、提升地方文化自豪感的有效途径。

现阶段镇山信仰研究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沂山研究的学术著作比较少，且多停留在名称考证、地理环境等表层问题。本文力图通过整理、爬梳明代沂山信仰，分析中国封建时期晚段东镇沂山镇山祭祀格局的历史变迁，解读明代沂山镇山祭祀的精神内核和其蕴含的政治含义，以期呈现明代东镇沂山官方与民间祭祀的不同特色以及佛道两教对镇山信仰的冲击。

本文选取明代作为研究时段，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明代之时包括镇山在内的岳镇海渎祭祀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明初，朱元璋下诏去除岳镇海渎封号，只以山水本名称其神，恢复了岳镇海渎自然神属性，国家对岳镇海渎的祭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沂山作为五镇之首，得到了统治者的格外重视，明代国家对沂山的祭祀空前频繁，祭祀的内容、形式、原因等都与前代出现了转变，非常具有典型性。

其次，明代距现在较近，存世史料相对较多。这其中不但有文献资料，还有实物资料，如东镇庙碑林等，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另外一些口述资料与前代相比，舛误相对少一些，内容也相对更加丰富。

再次，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国家虽对正祀的把持及其严格，而民间祭礼、信仰在此时期也迅速发展逐步达到鼎盛，思想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平民化。本文试图通过对比该时期二者之间的差异和互动，找到该地区沂山信仰中的国家与地方的不同表现。

因此,笔者选取明代为时间段,以沂山为研究对象,吸收前人有关山岳信仰的优秀研究成果,力求在以沂山为代表的镇山祭祀研究上能够有所突破。

二、论文研究背景

本文意图通过梳理明代沂山镇山祭祀格局形成过程,解读其蕴含的政治含义,进一步分析明代沂山祭祀格局精神内涵中的国家祭祀、民间信仰和佛道信仰等因素,由于本课题的研究领域涉及封建礼制下沂山信仰的形成与变迁过程,而沂山信仰属于封建国家镇山祭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对研究现状的回顾中将主要包含两个部分:1、东镇沂山的相关研究。2、其余镇山信仰祭祀研究。

1、东镇沂山相关研究

沂山是鲁中仙山,景区内的百丈瀑布和沂山晚翠位列临朐八大景之一,自然景色秀丽。此外,历朝历代对于东镇沂山文化的研究连绵不断,这也赋予该山以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首先,对沂山文化的传承体现在临朐、沂水以及青州地区的地方志书中。以明代嘉靖青州府志为例,书中在山川、建制等章节对沂山以及沂山上的相关人文景观做了详细介绍和记录。近年来,临朐县旧志编纂委员会对留存的临朐县旧志进行了编纂,其中成书于清雍正年间张敦仁编撰的《临朐编年录》中花了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历代对于沂山的祭祀情形,成为曾有十六位帝王封禅沂山的重要论据。

其次,有相当一大批关于沂山的专著得以出版。关于沂山的专著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临朐王居易所作《东镇沂山志》一书。该书完成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共上、下两册,分5卷,约3万字。卷一记述了沂山诸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卷二为《御制诏告祭文》,辑录了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的御制诏告祭文48篇;卷三为元代的祭文和明代有司春秋祭文,共15篇;卷四为元、明两代的《代祀记》和《重修庙记》共20篇;卷五共收录元、明两代诗作169首,其辑中有冯惟敏、李攀龙、雪蓑,乔宇等人的作品。王氏在写书期间,不仅遍访沂山山水,还参阅整理了当时存有的碑刻拓片等资料,呕心沥血,精心编撰。而此部志书,以元、明两代沂山相关祭文和诗歌为主,为人们了解该时期沂山信仰的特点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至清代,东镇庙住持赵身守编纂了《东镇述遗记札》一书,鉴于其东镇庙住持的视角,除了对当时东镇沂山的建制与自然景观做了介绍之外,还提到了佛教在东镇沂山的发展情况,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明清东镇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丰富。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镇沂山由于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得到临朐县政府的重视,于是时任临朐县人大常委主任的潘心德主编了《东镇沂山》一书,这本书不

仅用简洁流畅的语言叙述了东镇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承的问题，还配以大量精美的图画引人入胜，对于扩大东镇沂山的知名度起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但因其内容多数来自《东镇沂山志》以及临朐县旧志等志书，学术研究价值并不高。

再次，是关于沂山的著名人文景观---东镇庙碑林的相关研究。在传统观念中，“东方”是大地日出之所，万物初始之地，在方位祭祀的位置最为重要，相关祭礼也最为完善。因此，东镇沂山文化可以说是我国封建镇山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东镇庙碑刻则是东镇沂山文化的关键内核。张孝友先生花费三年多的时间，实地考察镇庙、穆陵关、明道寺、百丈崖、歪头崮等沂山范围内全部石刻，最后经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发行《沂山石刻》一书。该书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详细论证了东镇沂山与五岳、五镇之间的关系，以东岳泰山现存部分碑刻例证了东岳泰山、东镇沂山和东海在封建社会中祭祀和礼拜的重要性。书中对各处石刻的位置、尺寸、形状、雕技及行文格式等都进行了详细描述，尊重历史事实。该书的出版，对于研究所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解读东镇文化和地方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复次，有关沂山祭祀的研究还涉及到与道教的相关性研究，此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是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赵卫东教授。他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一书，共收录碑刻 157 幢，其中沂山碑 94 幢，包括元碑 8 幢、明碑 57 幢、清碑 26 幢、民国时期碑刻 3 幢。从碑目看，有御碑、代祀碑、祭告碑、诗碑、重修东镇庙碑等。通过对这些古碑文尤其是碑文中提到的东镇庙道士名字加以整理，赵教授在其文章《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提出以下两点：金朝末年全真道教就已经传播到沂山地区，守庙道士的名讳可以与全真道龙门派系谱相互印证；明嘉靖时期出身于华山派的东镇庙住持唐教玉在东镇庙创立了邱祖又派，造成了这一时期两派同处东镇庙的独特现象。此论文的刊发对于证明了沂山地区全真道教存在的真实性，而且为进一步了解其代际与派系传承在沂山一带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更为山东地区的全真道教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此外，关于沂山的相关论文基本上可以划分以下几类视角的研究：1、从水利生态的角度谈沂山水库、沂山地区动植物保护等问题，例如耿灵生、程素珍、孙俊生所写的《山东省沂山等 5 座中型水库存在问题及除险加固设计》、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孙立彦、赵遵国、刘振亮《沂山苔藓植物的区系研究》；2、从文化旅游的角度整体对沂山进行介绍，比如孟繁盛所著《中华五镇之首---东镇沂山》以及傅绍信《话说沂山》等文章，这类文章一般整体介绍的地理风光以及人文特色，内容比较宽泛，多属小品文、散文类别，学术研究价值不高。3、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沂山地区的文化特色：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

心的王芬教授在其文章《试论泰沂山北侧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从遗址分析的角度入手，系统的分析了沂山北侧大汶口文化的年代以及区域特征，提出鲁中南地区的文化因素对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河北师范大学的温玉春经过对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辨析，认为河图派中的九州之说---“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其中九州方位正是在泰山和沂山一带；林绍志考证沂山名称的来源以及该地区信仰中的天神文化，以为沂山中的沂字可以证明沂山就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历代帝王于此祭天，也为沂山打上天神文化的烙印。

日前，借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发展需要，东镇沂山更是大力倡导发展镇山文化。纵览以上相关研究成果，笔者以为，对于其它镇山乃至山岳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其余镇山相关研究

医巫闾山曾是幽州的镇山。《周礼·夏官·职方典》有云：“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王光在《医巫闾山的山神崇拜和民间信仰》一文中论及了北镇信仰的民间化问题，认为它既是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文化的产物，又是中原王族统治的工具。他提出医巫闾山镇山信仰呈现多民族化、多层次化的特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景泉在其文章《医巫闾山名称考辨》详细考证了北镇医巫闾山的得名，认为其名字来源于高句丽语。常乐的《中镇霍山考辨》一文中不仅考证了霍山的地理位置，还论述了霍山与岳山的关系以及入镇的过程，他认为霍山应当属于远古之岳山，但是作者并没有清楚论述霍山是如何成为镇山的。何平立的《略论明初海外镇山与郑和下西洋》一文结合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论述了明代的海外镇山，扩大了镇山祭祀研究的外延。聂立申的《会稽山新考》一文对南镇会稽山进行了考证，认为大禹治水时之会稽山为蒿里山而非今之会稽山，认定此乃以讹传讹之误。葛祥邻的《略论中国五镇之一的吴山阴镇文化》概述性的介绍了与西镇吴山文化相关的问题。

以上论文均是以单一镇山为研究对象，而东林的《华夏五镇文化探微》将五镇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该文仅简要将五座镇山的来龙去脉加以叙述，学术性较弱。

总而言之，目前其余镇山祭祀相关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论著数量较少，研究多停留在表层，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至于关于明代一朝的祭祀研究更属空白。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本文选取明代山东临朐的沂山神信仰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东镇庙碑林的碑刻（见赵卫东主编《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清代官方编纂的《明史》以及地方编纂的《临朐

县志》、《东镇沂山志》、《青州府志》等史料，结合近人对沂山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以期能够从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明代沂山信仰予以呈现。

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是关于本文选题的原因，然后介绍了目前关于山神信仰的相关研究状况，最后呈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介绍了沂山的自然地理环境，然后从官方信仰的角度对封建王朝历代的沂山信仰做一个总体的描述，第二章以碑刻和方志为主要资料探讨明代国家对沂山的祭祀，即描述明代沂山信仰的政治化特征。第三章侧重明代东镇沂山信仰的民间化过程，第四章介绍明代沂山的其它重要信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明代沂山信仰对后世的影响。结语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明代沂山信仰的发展状况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讨论和总结。

第一章 沂山信仰综述

一、沂山概况

沂山既是泰沂山脉的一个支系，也是沂蒙山这个人文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地处鲁中南山区的最南端，位于东经 $118^{\circ} 36'$ ，北纬 $36^{\circ} 10'$ ，行政区划上属于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距青岛 230 公里，西与蒙阴接壤，距泰安 140 公里，南与沂水搭界（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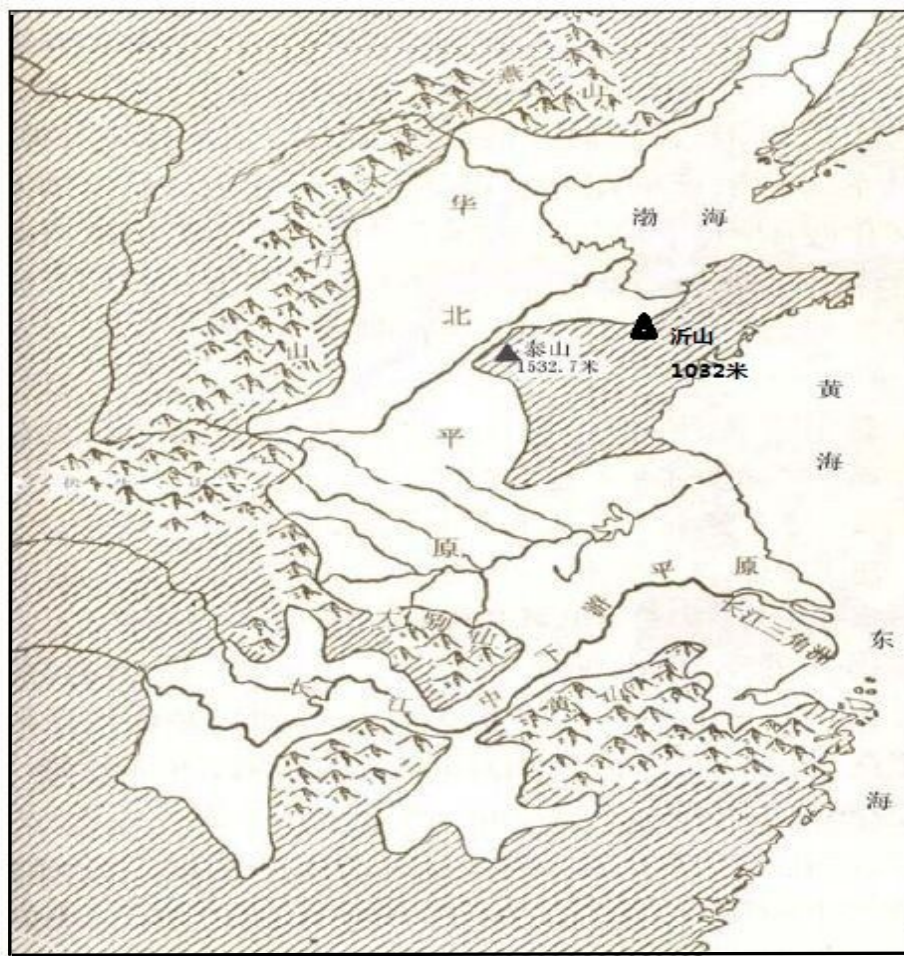


图 1-1. 沂山地理位置示意图

沂山，位于沂蒙山区北部，总面积 65 平方公里，以南险、北奇、东秀、西幽著称。主峰为玉皇顶，其海拔为 1032 米，是山东省内海拔排名第五，因山势高险，与地面温差较大。此地为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潮湿多有雨雪。受降水影响，山表植被丰茂，品种繁多，被称为天然氧吧。此外，歪头崮与狮子崮合成“双崮”，岩奇崖峻，山高势险，也是沂山的著名景点。

沂山，古为五镇之首，历史极其悠久。《东镇沂山志》云：“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

二山。浚川禹奠高山大川，沂山其一也。山在临朐县南一百里，即古盖与朱虚地。西侧远亲岱岳，东侧俯视琅琊，蜿蜒百里，高入云霄，遥望之青葱可爱。昔人所谓之东泰山，即此是也”。起初，黄帝在祭拜泰山时封沂山为东泰山禅丸山，舜肇定十二州后封山，又定沂山为青州重镇，此后夏、商、周代代相祭，秦祀更加车乘遥驹，到西汉太初年间，汉武帝东行泰山之时，莅临此地立祠并种植柏树致祭，魏文帝时期沉埋圭璋于此，直至开皇十四年（594 年），隋文帝下诏册封东镇沂山立祠并安排人主洒扫一事，唐贞观十年（636 年），唐太宗李世民册封东镇沂山为东安公镇守东方，宋代徽宗又加封他为东安王，其权威到达鼎盛状态。至明朝朱元璋登基后，下令去除全国的各路神灵封号，只保留其神位，因此沂山称神。清雍正年间又加封其为佑民捍御之神。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共十朝十六位皇帝曾经封禅沂山，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东镇沂山的宗教文化内涵，许多庙祠得以修建。据记载，远古时期曾修有五帝祠、尧王祠，西汉时期修建泰山祠，魏文帝建朝阳祠，隋文帝始建东镇祠，唐时修有凤阳寺。后宋太祖重修东镇庙，山庙落成后，他亲临祭拜，《嘉靖临朐县志》中记载：“东镇庙，旧合数镇之力修建，庙制恢宏，有碑记可考。期间受会昌法难等灭佛运动以及朝代更迭等战乱影响，寺庙部分几经损毁”。直到 1992 年，林业部批准沂山成立国家森林公园，临朐县委、县政府拨款重修了东镇庙、法云寺、明道寺等一系列景观，东镇沂山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除了修建用以祭祀的庙祠之外，历代帝王的到来还为沂山留竖了 16 幢御碑。这些御碑记述了皇家致祭沂山的缘由、致祭的情况等，是研究各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此外，沂山本就风景秀丽，自然风光引人入胜，于是越来越多的文人骚客接着皇家御祭的东风纷至沓来，观光揽胜，他们直抒胸臆，留下了大量的古碑石刻。这些古碑石刻与朝廷御碑一起，遍布东镇庙内外，形成了沂山上一道独特的人文与历史风景线——东镇庙碑林。据光绪三十年不完全统计，碑刻数量就有 360 余幢。后民国时期又有增竖。这些碑刻上的铭文字体不同，体裁多样，内容广泛，是国内罕见的珍贵的历史材料，既是我国古代书法雕刻艺术的瑰宝，又是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的写照。

沂山位于鲁中区域中心，接近国家的权力中心华北地区。其历史资料遗留中到处可以看到国家权力的在场，更遑论其历史起伏与国家的政策尤其密不可分。因此，笔者考察明代时期沂山信仰，其实更多的是考察明代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在沂山这个场域中国家政策与民间信仰二者角力的过程。

二、古代沂山信仰综述

1、四镇时期的沂山信仰

沂山作为鲁中仙山，又名东泰山，因其坐落于泰山之东且山体小于泰山而得名。它作为五镇之首受到崇拜是我国古代山岳崇拜不断发展的结果。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舜即位，于时分州十二，各封一山，以为一州之镇，沂山即为青州之镇”^[1]。因此，东镇之名始于舜帝。后至夏禹重分九州，为稳定天下局势，由十二镇山改为九镇。即“掌天下之图，辨九州，使同贯利……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藪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鸡狗，其谷宜稻麦……”^[2]。九座镇州之山，分别为荆州衡山、雍州华山、兖州泰山、豫州嵩山、并州恒山、青州沂山、扬州会稽山、幽州医巫闾山、冀州霍山。《周礼·职方氏》中郑注对镇山的解释为：“镇，名山，安地德也。四镇，山之重大者”^[3]，故而此处，镇山取安定四方之意。另外，对于镇山，唐代贾公彦也解释道“一州之内，其山川泽数至多，选取最大者而言，故郑注言其大者也”^[4]。此处释镇为重大之意。故而，就此处看，最初所谓镇山，即普遍意义上的涵盖所有能够镇压一方的大山。故而此时并没有岳镇区别。而沂山亦只是因为为青州之大山而位列其中。

随着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岳山逐渐成为国家对四方统御的象征。地位不断被抬高之后慢慢与镇山逐渐分离开来，后者开始逐渐缩小至特指四大镇山的范围。《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5]，东汉郑玄解释此处四镇为：“四镇山之重大者，谓扬州之会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医巫闾山，冀州之霍山”^[6]。随着国家不断统一，到隋代，四大镇山之说正式形成。“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并就山立祠……十六年正月，又诏北镇于营州龙山立祠，东镇、晋州霍山镇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庙”^[7]，因此至隋代，

^[1]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百七十八卷。

^[2]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夏官·职方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870页。

^[3]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夏官·职方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870页。

^[4]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夏官·职方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871页。

^[5]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春官·大司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474页。

^[6]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十三《春官·大司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475页。

^[7]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七《礼仪二》，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一版，140页。

原来的西镇霍山由吴山所代替，混乱不堪的镇山格局得到改变，东镇沂山、南镇会稽、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四大镇山格局正式形成。

关于东镇沂山的祭祀，《光绪临朐县志》卷五《谨案》中记载：

东泰山自皇帝登封，舜肇州封山，历夏及殷皆望秩沉埋，有加礼。秦加车乘遒驹，汉公玉带援黄帝故事，请武帝封东泰山。武帝亲至其下，令礼官祀之。魏文帝瘞沉圭璋。隋开皇十四年诏就山立祠，取侧近巫一人主洒扫，并多蒔松柏。^[1]

黄帝封沂山为东泰山的说法源自《史记·封禅书》。汉臣公玉带为了劝说汉武帝封禅沂山，就提到黄帝因为“封东泰山、禅丸山，合符，然后不死”^[2]。继黄帝之后，尧舜时期，中央先是将天下分为十二州每州封一座镇山，由皇帝来实施望秩之礼，即登高远望，“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3]。此望秩之典分为三个等级，五岳享受三公等级，四渎为诸侯等级，其余镇山等为伯子男等级。因此，舜帝时期以侍伯子男之礼望祭沂山。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穆王封禅沂山，其妃盛姬病故，葬于沂山绝顶。西汉时期，汉武帝为祭东夷族的司命-泰山神东行，在公玉带的陪同下顺便祭祀沂山，但是“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4]虽然没有对沂山进行封禅，但是汉武帝命人在沂山玉皇顶修建了有记载的沂山最早的古建筑——泰山祠。

至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登封沂山。清代张敦仁《临朐编年录》卷二“文帝黄初三年，瘞沉圭璋于沂山”^[5]。文帝来到沂山后，施以了瘞沉圭璋这样的大礼，圭璋是一种贵重的玉器，而瘞沉圭璋是将它埋到土里用以祭祀。皇兴二年（468年），李慧代北魏献文帝拓跋宏祭祀沂山，吉星田《东镇庙碑目》中收录有此。

至隋代，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诏东镇沂山就山立祠。东镇山神庙由此开创。此祠的建立对于东镇沂山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不管是于国家或者民间而言，祀庙的建立都意味着该神灵得到了认可，它是实施祭祀礼仪的最重要的物质依托。在隋代以前的沂山祭祀历史上，皇帝至沂山祭祀都是临时性的，没有固定的场所，汉武帝虽然修建泰山祠，但它并没有承认沂山作为单独的山神的地位。一直以来，沂山是名山是自然之神，它是虚无的飘渺的，是抽象的。但是在隋文帝建立东镇庙之后，沂山山神开始有了固定的祭祀场所，它开始由一个虚无的抽象的来自于自然的神灵向人格神转换。因此，可以说，以东镇

^[1]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之《光绪临朐县志》，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12月第一版，148页。

^[2]（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译，《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一版。

^[3]杨杰等编，《四书五经——尚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汉）司马迁：《史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3页。

^[5]（清）张敦仁编修：《临朐编年录》，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续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印刷。

为首的镇山祠庙的建立,标志着古代镇山格局的初步形成。而且,隋代还取侧巫一人,主知洒扫种植之事,意味着从隋代开始,派专人对寺庙进行管理,镇山祠庙的管理制度初步得以建立。此外,东镇庙碑目里面收有隋大业二年的隋碑《张须陀代祀碑》,大业为隋炀帝的年号,这说明隋炀帝也曾派人到沂山祭祀。

在中央王朝,随着四大镇山格局的不断确立,沂山作为镇山开始进入国家祭祀体系,成为包含岳镇海渚等地祀在内的国家山川祭祀体系的重要一环。最初的望秩之礼之后,沂山等镇山作为地祀的陪祀开始出现在国家的郊祀中。《晋书》记载:

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333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巫閭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1]

此之为沂山领衔其余镇山作为地祀陪祀由国家进行祭祀的开端。

到隋代,四大镇山祭祀已经成为国家山川祭祀体系的一部分,隋史中记载:

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

东汉郑玄对隋史注释到:“四望之礼”主要是针对:五岳、四镇、四渎。由此可以看出,隋代时,东镇沂山的祭祀已经位列国家祭祀体系,并且是属于中祀这一类别。

2、转型时期的东镇沂山信仰

隋代四大镇山格局形成以后,在唐宋时期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发展。唐初沿袭了隋代的镇山格局。直至天宝年间的山川神大分封中,霍山声名鹊起,开始与其它四镇并称。到宋代初年霍山作为五镇新成员开始在国家礼制中出现。《太常因革礼》中记载:

《通礼》,五岳四镇每年一祭,皆以五郊迎气日祭之,各于所属之地。《礼阁新编》,乾德六年(968年),礼官言:据□□□祭,以五郊迎气日记之,今岁立春止祭东镇沂山,余镇不祭……又开宝七年(974年),诏封霍山为应圣公于晋州,是为五镇。请准《通礼》于五郊迎气日记之,以本州长官充祠官。^[2]

由此可以看出从天宝七年(748年),五镇开始正式出现在国家礼制中。至宋徽宗时期,五大镇山被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中。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乾德六年(968年),五镇祭祀中只提到东镇沂山,而余镇不予祭祀,既与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得胜于此的传说有关,另外也与五代以后政治中心的东移有关。

就东镇沂山而言,唐代是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东镇沂山被诏封为东安公,

^[1] (唐)房玄龄撰,《晋书》卷十九《礼上》,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一版,585页。

^[2] (宋)欧阳修撰,《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一《祭五岳四镇》,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一版,293页。

这是其第一次受到帝王册封，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东镇沂山碑目》辑有唐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诏封沂山为东安公碑》，此外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中也有记载：“考诸祀典，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1]。在唐代中宗年间（684年），李显曾派遣工部尚书尹思贞代替他到青州祭祀东镇沂山。后来武则天又派遣使臣重新修缮东镇沂山庙。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李隆基登基后先是遣使修东镇沂山庙，几年后再次加封东镇沂山为东安公。唐肃宗二年（712年），曹州人邓景山代替皇帝到东镇祭祀。因此，从时间上看，唐代对沂山的祭祀基本上从未中断。

公元952年，后周太祖郭威亲至沂山致祭。《东镇沂山碑目》收录有《周太祖祭告东镇碑》。

至宋代，于东镇沂山祭祀更为频繁，留有碑刻26幢。宋代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重修东镇庙。传说，赵匡胤起兵创业之初，与后周大将军韩通决战于沂山，久攻不下，后得沂山神灵相助，取得战争胜利。于是登基后于建隆三年重修东镇庙以还愿。《昌国榦》记载，“庙故在山椒，据今庙三十里，宋始移此”^[2]。宋乾德二年（964年），沂山东镇庙新庙落成，十一月立东镇沂山界碑。仁宗登基后，亲自到沂山拜祭并且种植银杏树两株。熙宁年间，山东、河北两地大旱，国家派使臣至沂山祭祀祈雨。《光绪临朐县志》云“神宗熙宁八年，二麦大旱，京东提举李邦直祷雨沂山有应”^[3]。由记叙看来，此次致祭沂山已经不同于之前的普通祭拜，是带有目的性的祈福消灾的行为，这次致祭人为增加了沂山的兴云起雨的功能。政和三年（1113年）八月，宋徽宗因好大喜功，将所有镇山封号由公爵晋升为王爵，诏封东镇沂山为东安王。

隋代中央对东镇沂山的祭祀主要是郊祀的确立。自唐之后，这种中央的郊祀制度得以继承，只不过历朝历代稍有改动而已。除了中央祭祀之外，唐代伊始，派遣官员代皇帝致祭开始盛行。据不完全统计仅唐宋两代，皇帝遣官代祀东镇沂山就有十次之多。遣官代祀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个是于五郊迎气日祭祀镇山；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他大事临时遣官祭祀。

时间上来看，唐宋两代绝大部分祭祀都是在每年的三四月间进行，因为此时正好乃五郊迎气日的立春日。所谓五郊迎气日即立春日、立夏日、立秋日、立冬日以及土王日。古代传统观念认为，镇山所在的东南西北中方位应该与时节五行相对。因此要按迎气之时，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7页。

^[2]（明）傅国，《临朐县旧志续编》之《昌国榦》，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24页。

^[3]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之《光绪临朐县志》，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12月第一版，187页。

依次祭拜：

按五郊迎气之日，皆祭逐方岳镇、海渚。自兵乱后，有不在封域者，遂阙其祭。国家克复四方，间虽奉诏特祭，未着常祀。望遵旧礼，就迎气日各祭于所隶之州，长史以次为献官。”^[1]其后，立春日祀东岳岱山于兖州，东镇沂山于沂州，东海于莱州，淮渚于唐州。立夏日祀南岳衡山于衡州，南镇会稽山于越州，南海于广州，江渚于成都府。立秋日祀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西海、河渚并于河中府，西海就河渚庙望祭。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北海、济渚并于孟州，北海就济渚庙望祭。土王日祀中岳嵩山于河南府，中镇霍山于晋州。^[2]

故而东镇沂山致祭一般是一年一祭且于立春日进行。致祭官由当界都督刺史担任，牲用太牢。

中央祭祀和地方五郊迎气日祭祀的规制一般是固定的。而国家临时遣使祭祀则是基于皇帝自身意愿因而往往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遣使祭祀东镇沂山始于唐代天宝年间。这种祭祀形式打破了于立春日祭祀东镇沂山的惯例。《旧唐书》记载，“（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四海并封为王。遣国子祭酒嗣吴王诋祭东岳天齐王……太子率更令嗣道王炼祭沂山东安公……”^[3]此行由太子亲祭沂山足以说明唐玄宗对沂山的重视。在遣使代祀初期，其目的主要是告知山神国家大事的发生，直至宋代熙宁年间，皇帝派遣京东提举李邦直于沂山祈雨成功，才为东镇沂山增加了新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大文豪苏轼作有《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高田生黄埃，下田生苍耳。苍耳亦已无，更问麦有几。蛟龙睡足亦解惭，二麦枯时雨如洗。不知雨从何处来，但闻吕梁百步声如雷。试上城南望城北，际天菽粟青成堆。饥火烧肠作牛乳，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龙慵，共怨天公不怨龙。今朝一雨聊自赎，龙神社鬼各言功。无功日盗太仓谷，嗟我与龙同此责。劝农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诗先自劾。^[4]

此诗一出，更使东镇沂山声名鹊起，在之后的多年间，吸引更多的文人骚客至此领略沂山风采。在李邦直到沂山祈雨有应之后，每逢旱灾或其它自然灾害，国家或地方政府都会到沂山祈求保佑。沂山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话语权中的仪式神，它开始渐渐的与农业民生直接联系起来，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四大镇山向五大镇山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东镇沂山获封东安王，由立春日进行祭祀的祭礼也得以确定，重新修建的东镇庙更是为祭祀活动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国家对东镇沂山的祭祀逐渐朝着定期性、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切都

^[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零二《志五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一版，246页

^[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二《礼五》，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一版，2486页。

^[3]（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一版，934页。

^[4]（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为沂山信仰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3、五镇时期的东镇沂山信仰

唐宋以后，东镇沂山祭礼逐步走向正统和成熟。概括来说，金元明清时期的东镇沂山祭祀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祭祀封号的变化、祭祀礼仪和祭祀人员的确立以及东镇沂山庙的修缮以及庙制管理状况。

（1）祭祀封号的变化

金元承袭了宋徽宗时期册封的五镇爵位，但是称号上略有变化。《元史》记载：“成宗大德二年二月，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成德永靖王，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中镇霍山为崇德应灵王，敕有司岁时与岳渎同祀”^[1]。

在此次册封中，中央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于沂山树立《元成宗诏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碑》。实际上，元代册封的元德东安王最终成为沂山封爵的绝响。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扛起复古尊礼的大旗，大肆进行祭礼改革，革除一切名山大川的封号，只称呼其本名，并作为神号。

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开天辟地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以此为甚……夫礼之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2]

改制之后，东镇沂山之前的封号不复存在，只称东镇沂山之神。到封建王朝末期，清朝历代皇帝也没有再对沂山的称号做大的改动，只是沿袭明太祖所封的沂山之神号。到雍正帝登基后，才又加封沂山，称其为佑民捍御之神。至此，回顾沂山的封号，始封于唐代，称王于宋，元代定型，而明清去其人性还原至本来面目——东镇沂山之神。在封号的变化过程中，东镇沂山的镇山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在国家镇山体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化。

（2）祭祀礼制的变化

元代仍然承袭前代的遣使祭祀制度，但是又有新的创新，它根据祭祀的方位首创了分道遣使代祀制度。《元史》中记载：

岳、镇、海、渎代祀，自中统二年（1261年）始。凡十有九处，分五道。后乃以东岳、东海、东

^[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十六《岳镇海渎》，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一版，1900页。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九《岳镇海渎山川之祀》，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1284页。

镇、北镇为东道，中岳、淮渚、济渚、北海、南岳、南海、南镇为南道，北岳、西岳、后土、河渚、中镇、西海、西镇、江渚为西道。既而，又以驿骑迂远，复为五道。^[1]

东镇沂山与东岳、东海、北镇一起分属东道祭祀。而在祭祀官员的选择上，元代也比较有特色，与其它各朝记录中的遣使一人代祀不同，元代祭祀东镇沂山时一般会遣使两人，由二人共同主持祭礼：

道遣使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中统初，遣道士，或副以汉官……至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臣曰：‘五岳四渚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2]

由此记录得知，元朝初年，由于蒙古人刚刚建国，民族歧视比较严重，一是翰林院职位多由蒙古官担任，并且负责诏书的制作，汉人官员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至中统初年，蒙古官员已经不是祭祀的主体，这个主体变成了道士，汉官仍然是辅助人员。这种状况直到后来才得到改善，汉人的名儒才可以担任祭祀的主位，但是仍然需要得到道士的协助。

至明清时期，遣官代祀成为定制。明代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即敕命敦朴廉洁之臣金斗辅致祭东镇沂山之神。在出发前，“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渚之神。帝皮弁御奉天殿，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书省，使者奉以行。黄金合贮香，黄绮幡二，白金二十五两市祭物”^[3]。金斗辅后记有《敕记东镇沂山之记》，碑文云：

洪武二年春正月有四日群臣来朝。皇帝若曰，朕自起义临濠，率众渡江，宅于金陵，每获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于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迺者命将出师，中原底平，岳渚海镇悉在封域。朕托天地祖宗之灵，武功之成虽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实相予。况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祀秩尊崇，朕曷敢违？于是亲选敦朴廉洁之臣，赐以衣冠，俾斋沐端肃以俟，以正月十五日授祝币而遣焉。臣斗辅承诏将事惟谨，二月十二日祭于祠下，威灵歆格，祀事孔明，砬石镌文，用垂悠久。惟神丰隆磅礴，静主东方，典礼既崇，纲维斯在，尚期保安境土而福泽生民，是我圣天子之所望于神明者，而亦神明祚邦家之灵验也。

[4]

清顺治三年（1646年），“定北镇、北海合遣一人，东岳、东镇、东海一人，西岳、西镇、江渚一人，中岳、淮渚、济渚一人，北岳、中镇、西海、河渚一人，南镇、南海一人，南岳专遣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5]。可以看出，清代

[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十六《岳镇海渚》，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一版，1900页。

[2]（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十六《岳镇海渚》，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一版，1900页。

[3]（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0页。

[4]（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0页。

[5]（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志五十八礼二《吉礼》，二十六史，2235页。

的祭祀制度跟元代略有相似之处，都是使用的分道遣使祭祀制。在出行之前，该祭祀官员需要茹素，并且实施叩拜之礼与三献礼，要求非常的严格。康熙年间对祭礼进行了一番改动。康熙帝即位后，先是废除了派遣使臣祭祀的礼仪，直到康熙三十五年也就是1696年，因为祈福的需要，该祭祀才得以恢复。《清史稿》云：“（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为元元祈福，始遣大臣分行祭告，凡岳五：曰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镇五：曰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海四：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渎四：曰江渎、淮渎、济渎、河渎”^[1]。

除了中央遣官祭祀之外，地方官员也多有自发性的祭祀行为，其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沂山神已经成了庇护民生、保佑风调雨顺的代名词。

（3）东镇沂山庙的整修及庙制管理

金元之后，国家多次对沂山东镇庙进行修缮。《东镇沂山志》中存有多篇关于东镇庙的修缮记载，诸如翰林院侍读寿光刘羽时《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记载了成化二年（1466年）修缮东镇庙的情形，副都御使莆田翁世资的《东镇沂山寝庙成记》记载了成化六年（1470年）修建东镇庙寝殿以安东镇女神的过程，兵部左侍郎邑人迟凤翔记述了嘉靖年间东镇庙因时久就废，仅剩小室以安神位因而更寝宫为正殿，撤正殿作寝宫的过程。

在庙制的管理上，道教逐渐参与到东镇沂山庙的住持工作中来。在《金史》中有记载，正是因为沂山道士杨道全的请求，明昌年间才册封东镇沂山为东安王。因此可以推想这个杨道全必然在沂山山神庙管理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到了宋代哲宗时期，重修东镇庙神佑宫。据考证，此处神佑宫正是庙中道士清修之地。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记载，东镇沂山庙的住持道士赵守身去世。这说明在元明清三代，国家对东镇沂山庙的管理施行道教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政策。

小结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沂山信仰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山岳崇拜，作为众多的名山大川之一，它在发展初期并没有受到国家或者民众太多的关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四镇之首、五镇之首、成为国家山川祭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在于沂山山神有多重要，发展的多完善，而在于在时间的历史洪流中，历朝历代的执政者、权力的拥有者的选择。尤其是明代，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无论是从祭祀沂山的次数、祭祀官员的品级、对沂山庙宇的重修等方面，都为历代之最。在这一阶段，东镇沂山神固然已经成为国家山岳

^[1]（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志五十八礼二《吉礼》，二十六史，2234页。

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不局限于国家的场域，更多的是以一个有血有肉的民生庇佑之神存在着，其庇民消灾的社会功能逐渐超过了政治功能。

第二章 明代东镇沂山信仰的政治化

一、明代东镇沂山之神的册封

纵观史书记载，历朝历代对于东镇沂山的祭祀始终与岳镇海渚的祭祀捆绑在一起。明代对于沂山的祭祀最早见于《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记载，明洪武二年，对岳镇海渚的祭祀尚至为简陋，只“以岳渚诸神合祭城南，未有专祀。又享祀之所，屋而不坛”。此种情况应该与国家初定、民众困苦以及礼制尚未健全有关。

但礼官认为此非尊神之道，于是提请“以岳镇海渚及天下诸山川城隍地祇合为一坛。与天神埒，春秋专祀”，很快提请得到了准许，并于当年明太祖就下诏举行了明代第一次大规模的遣祭代祀活动。沂山也在遣祭之列，东镇庙现存《明洪武二年敕祀东镇之记碑》详细记载了金斗辅致祭沂山之事。

但到明洪武三年（1370年），形势发生了巨变，朱元璋下诏去除岳镇海渚封号，只以山水本名称其神。东镇庙现存《明洪武三年明太祖诏定岳镇海渚神号碑》碑文记载：

考诸祀典，知五岳、五镇、四海、四渚之封起自唐世，崇明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渚，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加，渚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渚，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1]

至此，东镇沂山恢复其自然神称号，国家对于岳镇海渚的祭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由此碑文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颁布此诏书其目的是简化天下诸神神号，因为在明朝之前的各个朝代的帝王赋予了非常多的称号在岳镇海渚这些山水之神身上，朱氏建国之后，认为此举欠妥。他认为山水之神受命于天，乃是灵气汇聚而成，凡间名号乃是凡人自己揣度所创，究其本身而言乃是对神灵的不尊敬。所以，朱元璋对山水之神名进行改革，去其凡间封号，只以神号尊之。

实际上，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通过对神灵的祭祀，让神灵来帮助自己威慑民众，稳固统治，历来是统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对神非常尊重的。尤其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出身草莽，通过农民战争取得政权的皇帝，按道理来说应该更加重视通过神灵祭祀稳定国家局势，增强统治力，但是事实却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竟然这样大规模的取消神号，这在古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究其原因，是由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1]赵卫东、宫德杰：《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 页。

造成的。

朱元璋是通过发动农民战争才建立起新的朝代。元代末年，蒙古统治者对民众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导致了各地农民起义频发，长年战乱导致明代初年社会经济萧条，百姓困苦，国库亏空。古语有云：“邦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战争和祭祀对国家的统治和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祭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加封，国家在祭祀上的投入不断增加，使得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而增加的投入，最终都是要加到百姓的身上。而出身于普通百姓的朱元璋深谙此理，深知增加百姓负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自己刚刚上台，百废待兴，如果为了场面浩大的祭祀活动而失去民心，进而动摇明朝的统治根基，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在历史长河行进过程中，像沂山神这样的来源于自然崇拜的神灵，被赋予相配女神与护卫，逐渐人格化。据明代莆田翁世资《东镇沂山寝庙成记》记载，从唐代起一直到元朝，就善于为山水之灵赋以帝王之号，其塑像“垂旒端冕，衣裳而坐，俨若人鬼，递相承袭，莫觉其非”，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为其设立神像，还增设女神配享以及众神加以护卫。而在太祖皇帝诏文中，诏封东镇沂山之神，其本意是正典礼，遵古制，恢复礼制，剥除高山阔水之神的人格神属性，恢复自然神属性，以示国家为礼仪之邦，乃正统之治，从而昭告于民，争取民心，同时取缔民间淫祀，把对神灵的控制权与皇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明太祖登极后，赐予山神封号，这既是对神的控制展示自己皇权在握，更是国家对地方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中央规定，地方官员上任之初，必须先行祭拜当地神灵。可以说，地方山神是皇权在地方的代替，监视着地方官员的施政行为。

实际上也有学者认为，明太祖诏书虽然极力撇清沂山神等自然神灵的人格属性，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个现实。从《东镇沂山寝庙成记》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设神之像以祭固为非经，复设女神以配其享尤为渎礼，左右又列男女之神一位从卫，其褻神黷祀孰有过于此哉”，但是其解决方案也并未去其女神，而是建立寝庙移女神于殿后，仅仅是在女神的位置上做了调换，以正典礼，顺愚民。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更符合传统的封建礼法以及男尊女卑的观念。因此，册封东镇沂山之神，本质上强化了沂山神灵的本源的自然化以及世俗的政治化特征。

在明代的祭祀过程中，沂山神是具有独立身份、独立地位的祭祀个体，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国家山川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明代东镇沂山信仰景观

信仰是信众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对某一源于自然或者社会又高于其事物本身的一种崇拜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活动。这种行为在实现时，必须要借助一种能够表达情感的介质，即实施信仰行为的场所，以及相关的仪式，这就构成了信仰景观。信仰是景观存在的基础，景观则是信仰的物质化表达与产物，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在研究明代沂山信仰时，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信仰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明代东镇沂山的信仰景观主要是东镇庙。东镇庙是沂山历史文化的缩影，也是这一独特文化的载体，这里既有存留至今的隋唐殿柱基石、宋朝祭台，更有众多的历代碑碣，尤其是御制碑刻。东镇庙承载了自隋初至清末封建王朝的重大祭祀，它作为假以施礼的媒介，注入了封建王朝礼制的内核，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1、东镇庙的建立

关于东镇庙的建庙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武帝设祠具至，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礼官祠之而不封”^[1]。但此时并未设立固定的祭祀场所，只是在山上举办一个祭祀的仪式，之后历朝历代皆循此制。

沂山建祠始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书》卷七《礼制二》云：

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冀州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2]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隋开皇十四年所建庙祠，即是今沂山东镇庙的前身，这对于沂山来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黄帝和汉武帝都已经在隋文帝之前到过沂山，但是他们的致祭都是偶然的、随意的，也都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也很难形成统一而规范的祭祀制度。但随着隋文帝立祠后，后世帝王致祭沂山便有了固定的场所，这为以后五镇祭祀的常规化与制度化打下了基础。

至唐代，仍然沿袭隋朝的祀制，而且并没有建立沂山庙。据《东镇沂山·东镇庙碑目》对7幢唐碑的记载中，有2幢是关于沂山的营造。词条一：武则天遣使“重修东镇沂山祠记”；词条二：《修东镇沂山记》^[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还没有“庙”的概念。

东镇庙的说法，正式见于纸端始于宋朝。《东镇沂山·东镇庙碑目》中《宋太祖诏重修东镇庙碑》记载：“宋建隆三年春三月始重修，乾德二年孟冬落成，历时三年有余。”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4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七《礼制二》，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一版，135页。

^[3] 潘心德：《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1998年9月，第8页。

但东镇庙到底是不是始建于宋，何时迁于此地，我们未尝可知。据明代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卷一《庙志》中：“父老相传，庙之始建也，有司卜地于大关社南大道之侧，栋梁既架，一夕大风撮去，莫知所在。翌日，沿山溪寻觅数十里始得之，即今建庙地”^[1]。此说法与“宋太祖钦建东镇庙”的传说情节吻合。但王居易没有提及宋太祖，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没有宋太祖建庙一说，这个说法是后人衍生的；二是有这样一个传说，王居易没有访听到，或者此传说出自野老之口，王居易以为荒诞，没有写入山志。王居易既然写沂山志，但在书中没有写建庙年代，只能说明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书面文字或碑石记载，但东镇庙至今尚存元大德碑，说明至少建于元代或者元代以前，也许是宋朝，也许是宋朝之前。这也与《光绪临朐县志》中说“东镇沂山神庙，在县东南八十里沂山之阿，山有庙，自隋始。旧在山椒，去今址甚远。宋代移建今地”^[2]之说有吻合之处。

至金元时期，沿袭历代对岳镇海渚的祭祀制度，对于沂山的祭祀和修缮应有多次，但现存史料中，仅能查证各有一次对东镇庙的施工建设记载。《东镇沂山·东镇庙碑目》中，对金碑的记载有“东镇修瓦殿记。金正隆四年，岁次己卯，六月戊戌。太学生刘口记，彭城刘仪记”^[3]。赵卫东教授编著的《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录入《元至治二年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庙神佑宫记碑》一文，详细记载了元初大德年间对东镇元德东安王的礼拜和对庙宇的修建，对研究元大德至至治年间东镇庙的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明代东镇庙

明初，随着朱元璋去除岳镇海渚的历代封号，恢复去本身的自然神属性，对岳镇海渚的祭祀成为定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此基础上，沂山东镇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对东镇庙的重修是历代次数最多的，有9次之多，现存于庙中关于重修庙宇的碑石还有7通。（详见附表2-1）

明洪武九年（1376年）《敕修东镇庙记》碑是明朝最早的一次对东镇庙的重修记录。此次大修由临朐县具体承办，主持修建人为知县赵原亨。碑文中记载“非常之工，求取非常之材”的字样，文中对用工、用料，如柱、砖、瓦等都有准确的记录，并附参与其事的地方官题名于后。由此可见，山东各地方官对敕修东镇庙的重视程度。但由于碑文漫漶不清，多不能详细考证。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4页。

^[2]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之《光绪临朐县志》卷之五，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12月第一版，148页。

^[3]潘心德：《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1998年9月，第9页

第二次重修是明成化三年（1467 年），记于明成化三年《重修庙记》碑。成化二年（1466 年）冬，时任巡抚山东右都御使的原杰，拜谒东镇庙。他认为“庙之弗飭，何以妥神灵”，所以令当时的青州府知府李昂、临朐县县令卜钊等地方官重修东镇庙。先后建成了正殿和东西序十五间；神库、神厨、披兵房、宰牲房、门楼二十五间；洪武御碑亭、御香亭、三门五间。此外，还对公馆等接待设施进行了粉饰，重修后的东镇庙轮换辉耀，巍峨壮观。

三年之后的明成化六年（1470 年），又对东镇庙进行了修建寝庙的工程。此次工程记载于明成化八年《东镇沂山寝庙成记》碑。该碑记载，明成化六年，春夏无雨，旱情严重，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翁世资携郡邑官员叶冕李裕李昂等到东镇沂山祈雨。祭礼结束后，为正名分，创建寝殿，移东镇沂山之神殿内女神于寝殿。当年十月开工，建成寝庙五间，左右两庑共十间，于第二年闰九月竣工。

距明成化三年（1467 年）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对东镇庙重修后的 48 年，明正德十一年（1516 年）东镇庙又一次得到了重修。当时的青州知府朱鉴到任三年，百废待举，决意重建年久失修的皇家御庙——东镇庙。《重修东镇庙记》记载有此次重修的详细记录，“今以饥谨相扔，乌合弄兵，于青者尤为甚。故材木四空，民生告劳也甚矣”。本次重修历时四个月，重修了龙亭、正殿、东西廊、寝庙、东西厢、碑楼等。

明嘉靖五年（1526 年）和二十八年（1549 年）对东镇庙进行了两次重修，但是地方史料中均未对着两次重修进行记录，仅存于《东镇沂山志》卷一《庙制》中，也无碑刻资料。嘉靖五年的重修是由知县王舜民主持的。嘉靖二十八年，正殿倾塌，时任临朐知县王家士进行了重修，但此次重修，却将原本高大壮阔的五间大殿改建成了三间小殿。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至四十年（1561 年）的一次大规模的重修东镇庙是由时任东镇庙主持的道士唐教玉发起的。《重修东镇庙题名记》碑中记载：东镇庙宇近年以来，风雨摧残，神像暴露。本庙主持唐教玉等具呈至县，转由本府兵备道。此次重修是由临朐、沂水二县，夫役督工、修理。

明隆庆三年（1569 年）对东镇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其规模仅次于开国之初的洪武九年。由临朐人、时任兵部侍郎的迟凤翔在《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中详细记载：“入嘉靖辛卯以来，废殆极矣，而正殿亦废”^[1]。文中所说正殿损害到什么程度呢？大殿倾塌以后，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改建的仅能供奉神像的小室，根本体现不了皇家御庙的规制，由于东镇庙大殿狭小，为祭祀带来了很多不便。每次摆放供品，都要搭设棚帐。长期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 年 11 月第一版，144 页。

以来，即劳民，又浪费钱财。同时，破旧的大殿与后面相对宏阔的寝殿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对大殿进行重修，有很大的困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临朐县上下民众，筹集善款四百金。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时任大理寺左评事顾从义没有办法，只能建议把寺庙原来的寝殿改建为正殿，然后再将正殿的材料拆换下来建一个小一点的、简陋一点的寝殿。众人商量之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先是对建于成化八年的寝殿进行修整，改为大殿，用于供奉主神。然后在原来寝殿的后面重新建造了五间小房，作为新寝殿，在新的寝殿与大殿之间修建穿廊以连接。这件事情发生在明朝隆庆三年间，时人对其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记录。这次对东镇庙大殿的迁址，是金、元、明以来唯一一次对其进行迁址的记载。

时隔 45 年后的 1614 年，即明代万历年间，明朝廷主持了对沂山东镇庙的重修，在这次重修中，把大殿挪回了原来的地方。青州人赵秉忠（1573-1626，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状元）在其《重修东镇沂山庙记》一文中详细记述了这次重修缘由和重修过程。文中描述此时的东镇庙是“庙制渐颓，亟欲营缮”。重修大庙用的时间为：“不三月大殿落成。此固神明灵赐之。（响）臻实我公精诚之潜格也。”新庙的建制是：“次建寝殿，次钟鼓楼，次东西二庑——”^[1]。

在整个明朝的 270 余年中，东镇庙的兴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国家的社会经济实力变化。明成化八年，创建了寝殿，当时的寝殿高阔雄伟、富丽堂皇。此时的明朝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有能力对东镇庙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到了隆庆三年（1569 年）对东镇庙大规模的重修则是主要针对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重修时将大殿改成小殿所造成的不便而进行的。即便这样，隆庆三年重修时也是面临资金和原料不足的困难，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极度颓废。

从东镇庙的修葺过程中可以看到明代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同时可得之，这些修缮行为均为地方官员自发行为，首先这与地方官员政绩要求有关，此外，因地方官员到任后必须先敬神，凸显出东镇沂山神作为地区性主神，是国家君主意志的执行者，是君主权力在地方上的体现，因此，对神的尊敬也就意味着对皇权的尊敬。

^[1]赵卫东、宫德杰：《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86 页。

时间	主持修 建人	撰文	书丹	篆刻 人	建设内容	碑刻 (碑文) 名称	源出
唐长安 四年						武则天遣使重修 东镇沂山祠记	见碑林 名录
宋建隆 三年						宋太祖诏修东镇 庙碑	见碑林 名录
宋乾德 二年						沂山东镇庙落成 记	见碑林 名录
金正隆 四年	刘□	刘仪			东镇修瓦殿记		见碑林 名录
元至治 二年	张德显 唐志迁 梅道隐	桑居敬	邴道顺	邴道顺	神佑宫三门 隐殿	东镇沂山元德东 安王神佑宫记	存庙内
明洪武 九年	赵原亨				大殿、三门、灵 星门、御香亭、 二门、龙亭	敕修东镇庙记	存庙内
明成化 三年	李昂 卜钊	刘翊	李昂	徐弼	大殿、公馆、三 门、御香亭、龙 亭、东西庑、神 库、神厨、披兵 房、宰牲房、门 楼	重修庙记	存庙内

表 2-1. 历代重修东镇庙记录表

时间	主持修 建人	撰文	书丹	篆刻 人	建设内容	碑刻（碑文） 名称	源出
明成化六 年	李昂	翁世资	殷谦	王琳	东西庑、寝殿	东镇沂山寝 庙成记	存庙内
明正德十 年	朱鉴 杨谏	杨谏			大殿、三门、灵星 门、龙亭、东西庑、 披兵房、宰牲房、 寝殿、碑楼、碑亭、 钟鼓楼、祭器库、 五驿	重修东镇庙 记	存碑文
明嘉靖五 年	王舜民				大殿		《东镇 沂山庙 制记》
明嘉靖二 十八年	王家士				大殿改小		《东镇 沂山志 庙制 记》
明嘉靖三 十七年	唐教玉				寝殿、两庑、灵星 门	重新东镇庙 题名记	存庙内
明隆庆三 年	张体干	迟凤翔	张邦彦	魏勋	大殿（大殿改）、 二门、碑亭、钟鼓 楼	重修东镇庙 碑记	存庙内
明万历四 十二年	麻友椿	赵秉忠	张东光	常裕	大殿（改旧址）、 东西庑、寝殿、钟 鼓楼	重修东镇沂 山庙记	存庙内

续表 2-1. 历代重修东镇庙记录表

时间	主持修 建人	撰文	书丹	篆刻人	建设内容	碑刻(碑文) 名称	源出
清康熙 二年		张印立	孙席庆	吴士铨	大殿、龙亭、宰牲 房、寝殿、两配殿	重修东镇庙 落成碑记	存庙内
清康熙 四十年	张昆诒 陈霆万	陈霆万			大殿等	重修东镇沂 山庙记	存庙内
清嘉庆 五年	蒋清				大殿	重修东镇庙 落成诗记	存庙内
中华民 国二十 九年		李焕章	李焕章		寝殿	重修寝殿记	存庙内

续表 2-1. 历代重修东镇庙记录表

3、东镇庙碑林

沂山作为五镇之首，历来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册封、祭拜，以及文人雅士的游览题咏，留下了大量的碑碣。这些碑碣大多集中在东镇庙内，故有“东镇庙碑林”之称。

建国初期，据东镇庙村民回忆，清末的东镇庙大小碑碣 260 余幢。后因日军侵华和人为破坏等原因，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竖立的碑碣仅余三通。后经复立，到 1987 年，一共复立碑碣 85 幢。据潘心德《东镇沂山》一书收入的碑目看，一共有 271 条。其中汉碑 1 目，北朝 2 目，隋代 2 目，唐代 8 目，金代 9 目，元代 29 目，明代 122 目，清代 69 目。其中明代数目最多。

东镇碑林中的碑文内容多样，明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序文中“故昭代庙祀有典，各封有诏，一监周镇焉。且革命必告，雨旸祈，兵灾祈，圣嗣祈，载在诸祭文，至炳琅也”。这段话把帝王与官府祭祀沂山分为“革命、承统、雨旸、兵灾、圣嗣”五类，另外还有常规的祭祀碑、诏旨碑、庙殿殿宇的创建碑、重修碑、文人雅士的题名碑、诗歌碑、散文碑、庙宇田产界碑、道士墓碑等，总计十余种。

东镇庙碑林犹如一部史书，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可补史之缺，或佐

证历史事件的发生。二是一些祈雨碑，很清楚的记录了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对于我们研究古代自然地理和古代百姓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三是对研究镇山祭祀和镇山文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是一些文人雅士的题名碑刻，并未见诸于历史典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东镇庙碑林尤以明代碑刻最多，说明明王朝对于沂山祭祀十分重视，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国家礼制对于镇山的祭祀情况、自然变化和文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三、明代沂山信仰的官方祭祀

东镇沂山神信仰在明代备受推崇，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发展变化是与国家政治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央和地方多次对其致祭。就祭祀主体而言，封建国家对沂山神的祭祀可分为中央致祭和地方有司致祭两个层次。二者在祭祀的内容、规模、程序以及参与人员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一些地方官员的自发性祭祀也体现了沂山神信仰的政治性特色。

1、中央致祭

明朝建立后，为显示自身政治权利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恢复了《周礼》中的祭祀传统，祭祀有等级之分。中央致祭有常规祭祀和非常规祭祀之分。

(1) 常规祭祀

明代的中央致祭有皇帝亲祭和遣官致祭两种。一般在都城举行的对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进行的祭祀，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但是如果有其他大事发生，必须告祭山川者，因路途遥远，多有不便，故而大多为临时遣官祭告。于都城进行的皇帝亲祭按祭祀内容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镇山祭祀属于中祀。其余大祀为圜丘、方泽、宗庙、设计，中祀为朝日、夕月、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渚、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司中、嘶鸣、司民、司禄、寿星，其它诸神为小祀。于每年仲秋时节祭祀五镇。

明代建国后，朱元璋要建立明朝自己的国家祭祀体系，镇山祭祀在中央致祭中的地位多次发生改变。明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五镇之神于夏至祭地方丘时从飨，在祭祀中属于从属地位。同年九月，即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然后命有司春秋致祭。洪武二年（1369年）伊始，建山川坛制，五镇及其他山川、城隍等地祇合为一坛，改为每年清明、霜降两次祭祀。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甲子，与天神坛合为一坛，由皇

帝亲自行礼致祭。六月癸亥，正式颁布诏书去除前代所封名号，称东镇沂山之神。洪武九年（1376 年），山川坛制再次发生改变，东镇沂山领衔五镇单独划为一坛，分属正殿七坛之一，仍由皇帝亲自行礼。至此，中央对镇山的祭祀祭祀最终确定下来。

（2）非常规祭祀

除了常规祭祀之外，因为一些特定的事件，国家对东镇沂山神进行非常规祭祀。以明代王居易所辑《东镇沂山志》为参考，其中共收录非常规祭祀御制祭文 48 篇，加以整理发现此 48 篇祭文源于四类事件：皇帝登极、将士出征、皇室册立以及自然灾害。

A. 皇帝登极

明代王居易《东镇沂山志》关于明历代皇帝登极致祭记录如下表：

时间	派遣官员	官员品级	致祭缘由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	道士杨崇翊、熊启南	道士	登极嗣位
洪熙元年二月	工部左侍郎许廓	正三品	登极嗣位
宣德元年二月	工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黄福	正二品	登极嗣位
正统元年正月	吏科给事中车逊	从七品	登极嗣位
景泰元年闰正月	礼部左侍郎仪铭	正三品	登极嗣位
天顺元年三月	彭城伯张瑾	比照一品	复正大统
成化元年三月	尚宝司司丞李木	正六品	登极嗣位
弘治元年三月	大理寺右少卿李介	正四品	登极嗣位
正德元年四月	光禄寺少卿杨潭	正四品	登极嗣位
嘉靖元年四月	尚宝司卿刘锐	正三品	登极嗣位
隆庆元年十月	大理寺左评事顾从义	正七品	登极嗣位
万历元年四月	前军都督府管府事安乡伯张鉉		登极嗣位

表 2-2 明历代皇帝登极致祭记录表

皇帝登极可以说是非常规祭祀中最重要的致祭活动，因为它是将皇权合法性昭告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名义上是致祭神灵，其本质更在于确立对国家疆域内乡民的统治。明制

对此有明确规定“各处山川、土神、古今圣贤、忠臣烈士，能御大灾，……惟岳镇海渚及历代帝王陵墓，凡遇登极者必遣官分投祭告，特重其礼”^[1]。遵制守典，这是直接关系到皇权自身是否合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明代历位皇帝都对此高度重视。

在太祖高皇帝诏文诏封东镇沂山之神之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遣典仪臣郑玉琳告东镇沂山之神。朱元璋作为明代开国皇帝，推翻前朝统治，对天下而言是彻底性的变革，因此其御制祭文在颂扬神灵之后即陈述自己登极的合理性，在于“元君失驭，海内鼎沸，生民涂炭”，自己起兵推翻元朝统治是顺应天命“承上天后土之命”，更有“百神阴佑”，因而自己建立的新朝代是合理合法是得到上天和众神庇佑的。朱元璋在此祭文中也解释了东镇沂山之神封号的原因，“神之所以灵，人莫测其职，必受命于上天后土，为人君者何敢预焉”^[2]，在当时，神灵对人世来说，是幽微莫测的，此篇御制祭文表达了对神灵的敬畏，增添了东镇沂山之神的神秘感，而自己登极的过程得到了神灵的许可，更是顺应天意的，是合乎礼法的，是民心所向的。朱元璋作为明代开国皇帝，其祭文中表达的是对原有建制的变革，表达的是其灭元建明是合乎正统的。因此，通过该御制祭文，朱元璋不仅在事实上，也在形式和理论上向地方民众宣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明建文元年（1399年），原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荣登皇位。史称“靖难之役”，这是明初围绕皇权斗争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因为建文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钦示继承人，因而朱棣登极受到了许多文臣武将的反对。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朱棣遣道士杨崇翔、熊启南祭奠东镇沂山之神，正告于神自己登极乃是遵奉祖训，并且得到天地山川之灵的帮助，自己起兵并非谋反，而是因为“建文昏庸，奸臣窃柄，神明弗佑，四海离心”^[3]。故而，在此篇祭文中，宣告自己具有继承明朝皇统地位的资格，是此次祭告活动的目的所在。

此后，除明代宗朱祁钰、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以及明思宗朱由检四位外，其余列为皇帝均于登极之初赐祭于东镇。

B. 将士出征

明代有记载的源于将士出征对东镇沂山进行致祭有三次：分别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五年（1407年），具体详见下表：

^[1]许嘉璐等编，《二十四史全译》之《明史》卷二《太祖朱元璋》，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一版，118页。

^[2]（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7页。

^[3]（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8页。

时间	派遣官员	致祭缘由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	神乐观道士诸不溪、国子监生王葆	将士出征
永乐四年七月	道士吴宗显、监生张初致	将士出征
永乐五年五月	道士杨寿山、监生李俊致	将士出征

表 2-3 明代将士出征致祭沂山表

明朝建国初年，国家尚未统一，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朱元璋诏龙州土官赵宗寿入京遭拒，大怒，于是命杨文统兵十万前去征讨。兵至龙州，土官赵宗寿伏罪。杨文移师征讨奉议、南丹诸州，后又进讨都康、向武、富劳、上林诸州县，杀向武土官黄世铁等万余人，兵行路难，战事艰辛，遣神乐观道士诸不溪。国子监生王葆，祭告东镇之神，求助神灵的帮助。其文曰：

昔者元运将终，英雄并起，民受其殃。时予亦与群雄并驱，辑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灵，所在必克，转战五年余，方乃兵偃民息。众乐生生之计，天下太平二十八年。今洪武乙亥四月间，广西布政使司报蛮夷酋长龙州赵宗寿，奉议州黄世铁，不循治化，负固殃民。兵兴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万，各离父母妻子，途间饥饱劳役，山岚瘴气染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难，兵入其境，良民受害，且大军所过，荆棘生焉，民惊且移，未有不伤者，此其所以告也。其所告也，但欲瘴疠之方，化烟岚为清凉之气，早殄巨魁，良民安业，军士速回，各得完聚，以养父母，是其祷也。^[1]

洪武之后，永乐四年（1406 年），皇帝出兵安南，征讨贼人黎季牦及其子黎苍，出兵之前，遣人以香帛牲醴致祭沂山，希望：

神灵鉴予诚悃，闻于上帝，赐以鸿庥，潜消瘴疠，大振军威，早灭渠魁，永安遐壤。

永乐后，国家逐渐安定，因战事出征的致祭逐渐减少。

C. 皇室册立

皇室册立本是皇家私事，而封建社会家天下的观念模糊了这种皇家家事和一国之事的区别，使得皇室的册立、迎娶之事已经成为巩固国本事关国运的重要内容。由于此类原因求助神灵也出现在明代的祭祀之中，查证史料相关记录有以下两则：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 年 11 月第一版，128 页。

时间	派遣官员	官员品级	致祭缘由
嘉靖十一年六月	山东青州府临朐县知县褚宝	正七品	储宫未立
嘉靖十七年七月	山东青州府临朐县知县陆昌	正七品	天赐元储

表 2-4 明代皇室册立致祭沂山表

嘉靖十一年（1532 年），皇帝遣临朐县知县褚宝，致祭东镇沂山之神以求子：“朕以寡昧良，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兹，敬事神祇，罔敢不懈，顾储宫未立，恒切于怀。兹者特具牲帛醴仪，遣官虔祷。伏望茂着神功，锡予元嗣，则我国家绵庆祀于无穷，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1]。在祭文中，皇帝痛陈自己登极十一年来敬事神祇，罔敢不懈，希望众神体恤自己，赐予子嗣。需要注意的是，此祭祀名山大川以求子并非由皇帝本人决断，乃是由重臣李时提出，皇帝许可，因而是一个国家性的政治行为。

在此次祭祀后的数年间，先后有十几位皇子皇女降生。因此，时隔六年之后，嘉靖十七年（1538 年），皇帝遣官致谢东镇沂山之神，感谢赐予皇储。“比岁尝命官祷嗣于神，昨于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赐远处，亦神所赞佑者，兹用致谢，神其鉴歆，而永为默佑焉”^[2]。

D. 自然灾害

东镇沂山被赋予消灾弥祸的社会功能源于宋代李邦直至沂山祈雨有应，之后历朝历代都有因自然灾害到沂山祭祀的记载。

至于明代自然灾害频发，各种洪涝、旱灾、地震、蝗灾等层出不穷，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是传统农业社会，而自然灾害直接摧残了农业的发展。因而在这一时期，大量人口因灾死亡，社会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为了安抚社会民众，针对农业和民生的祈福消灾便成为祭祀的重中之重。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 年 11 月第一版，132 页。

^[2]（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 年 11 月第一版，132 页。

时间	致祭官员	官员等级	致祭缘由
宣德十年五月	临朐县知县任荣	正七品	祈求神灵庇佑
正统二年五月	临朐县知县任荣	正七品	祈求神灵庇佑
正统九年四月	翰林院编修杨鼎	正七品	大旱
景泰四年五月	刑部尚书薛希琏	正二品	雨雪过多自然灾害
景泰四年七月	翰林院编修戚润	正七品	洪涝灾害
景泰五年五月	太常寺少卿李宗周	正四品	田畴缺雨
景泰六年六月	刑部尚书薛希琏	正三品	自然灾害
成化四年五月	巡抚山东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原杰	正三品	自然灾害
成化六年五月	太常寺事礼部尚书李希安	正二品	天时久旱
成化八年三月	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翁世资	正三品	祈雨
成化九年四月	礼部左侍郎刘吉	正三品	山东久旱
成化十三年五月	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陈俨	从二品	自然灾害
成化二十年三月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戴珙	从二品	雨雪地震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	礼部左侍郎黄景	正三品	天时亢旱
弘治四年四月	通政使司左通政史元守直	正四品	天时亢旱
弘治六年四月	巡抚山东都察院左佥都御使 王霁	正四品	去冬无雪，今春少雨
弘治七年十一月	内官监太监李兴、太子太保 平江伯陈锐、都御使刘大夏	从一品 正二品	黄河决堤

表 2-5 明朝历代皇帝遣官致祭沂山祭文表

时间	致祭官员	官员等级	致祭缘由
弘治十年四月	山东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熊翀	正四品	亢旱
弘治十七年六月	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徐源	正三品	亢阳为虐
正德六年十月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 议吴江	从四品	四方多事、水旱
正德七年九月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 黄锈	从四品	匪盗 水旱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	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使沈应龙	正三品	黄河决堤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	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使沈应龙	正三品	河道竣工以报神
嘉靖四十五年闰十月	总理河道漕运工部尚书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使朱衡	正三品	新河建成
隆庆三年十一月	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使姜廷颐	正三品	水灾异常
隆庆六年六月	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 御使傅希擎	正四品	漕河横溢

续表 2-5 明朝历代皇帝遣官致祭沂山祭文表

作为镇山之首，东镇沂山在中央祭祀体系的位置非常重要。可以说，由于登极、战事或者灾祸等原因进行致祭不仅是皇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也对统一当时的社会信仰和价值观念、稳定全国的社会局势以及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2、有司春秋致祭

有司祭祀主要是地方官吏按照国家祀典的规定，每年自行组织的于春秋两季进行的祭祀活动，是国家祭典中规定必须要进行的致祭定制。

关于有司春秋致祭，其中有司指的是官吏，也就是说该祭祀主体为地方官吏。《东镇

沂山志》收录有司春秋祭文一则：“维某年某干支，某月某干支，青州府临朐县知县某，敢昭告于东镇沂山之神曰：“惟神钟秀崇高，一方巨镇，封表有年，功着民社，时维仲秋春，谨以牲帛醴齐饕盛庶品，用伸常祭，尚飨”^[1]。由祭文看来，有司致祭与国家遣使祭祀不同，它是常规性祭祀，一般由知县主持，祭文比较简单，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祭祀事由。

此外，《东镇沂山志》中还收录有“御祭陈设图”和“有司春秋致祭陈设图”，详细介绍了祭祀的流程和规章制度。

综合国家祭祀东镇沂山神的两种方式：中央致祭和地方有司致祭可以发现，国家对于东镇沂山之神的祭祀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国家对沂山神的祭祀之频繁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性色彩。国家权力介入到沂山神信仰中，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行为，展现了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其次，国家致祭东镇沂山之神等级严密，将其视为国家山川祭祀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祭典的规制要求，从祭祀用品、祭祀人员到祭祀礼仪，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再次，国家致祭沂山更多的是注重其仪式性的意义，并非像民间信仰一样单纯追求是否灵验，注重功利目的。

3、地方官员自发祭祀

地方官员是国家行政命令的执行人，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为了国家正常的管理统治秩序而存在的。封建社会，农业是经济的命脉，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业发展受天气等影响很大。因而这一群体致祭东镇沂山之神其目的主要是冀求弥祸消灾，保佑农业丰收。

国家对东镇沂山神的祭祀，偏向于沂山神信仰的自然以及仪式属性。沂山神是自然之神，是沟通上天和皇权的媒介；是仪式之神，通过这个仪式，国家可以宣示其主权，牢牢控制地方。虽然其祭祀主体也是地方官员，但是这与本处提到的地方官员自发祭祀沂山是不同的。二者的确都体现了东镇沂山神信仰的政治化，但相较而言，前者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是每逢国家发生大事皇帝遣使进行代祀，而地方官员祭祀沂山，则是地方权力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员更多的是将其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格神，充分体现了明代士大夫的儒家人本主义思想和现世性观点。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置青州府。辖下设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和益都、临淄、博兴、寿光、昌乐、临朐、安丘、诸城、蒙阴、沂水、日照、昌邑、高密、即墨、高苑、乐安16个县。东镇沂山作为辖区内最重要的镇山，是该地区民生民计的精神支柱。故而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34页。

每当出现自然灾害、天象异常时，地方官员均赴东镇沂山进行祷祀。在祷祀前，祭祀者需吃斋沐浴，戒荤腥，诚心请愿，体现对神的敬畏与尊重。

地理上而言，山东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春秋两季易发生旱灾。所以祈求沂山神明兴云致雨就成了地方官员祭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地方民众而言，他们在求雨时可能祭祀对象以传统龙神为主，然后夹杂其它神明，但是就地方官员而言，由于国家对东镇求雨功能的认可，使得地方官更多时候乐意接受东镇沂山为其致祭对象。虽然，地方官员的求雨活动并不像国家祭祀考虑多个方面，他们这种行为更多时候是灾难来临之时的一种本能反应而已，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地方官员的沂山祭祀活动还是深深打上了国家权力的烙印。以明弘治五年（1492 年）致祭为例，当年天气大旱，饥民遍野，钦差巡查海道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带分巡海右道副使赵鹤龄致祭东镇沂山之神，希望神能悯此生灵，国家元气，念此地方供御所系。在此祭文中，东镇沂山神与民生的关系被表述为“民惟邦本，食惟民天，神依人而血食，人赖神以安全，神人相须，理之自然”，突出保护当地民生乃是东镇沂山神的职责所在。对神而言，应该御灾捍患，而于官员自身，当修政省躬，检视自身。

除了旱灾对农业影响较大之外，蝗灾也不可忽视。嘉靖十二年（1533 年），临朐县令褚宝敬告东镇沂山之神曰：

尝闻古有善政，蝗不入境。惟兹小邑，频年以来蝗旱相仍，民乃艰食。实某等奉职无状，不能敬神恤民之所致也，罪复何辞？加以去冬无雪，今春无雨，蝗蝻复生，二麦几乎不登，三秋将失所望，民不堪命，心竊忧惶。^[1]

此祭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褚宝提到，之所以蝗灾发生，是因为自己施政有误，不能敬神恤民导致的。受传统的祭祀观念“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等思想的影响，人为创设了一个有神在操作的监控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神灵评判着人的行为，通过降灾送福，予以赏罚。因而，灾害发生的时候也为施政者提供了一个为政自省的时机。在本地蝗虫扑灭后，邻县沂水又有蝗虫飞来，褚宝乞之于神曰：“神乃一方之镇，而朐又密迩于神者也。默相之庥，必先由近以及远，治理之序，亦惟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苟年谷不登，则孳生不备，虽神亦无所致力也，而况于民乎，而况于有司乎？”在本地蝗灾消灭而外来蝗虫致灾时，褚宝提到，之所以沂水地区仍有蝗灾是因为沂山之神离临朐比较近，处理问题有由近及远的顺序。此处以人的心态推及于神，并且为沂水地区的蝗灾找到借口以娱神，完全是赋予了神人的姿态。最后，褚宝虔诚的祷告于神，如若神明能够驱蝗成功，那么“余将告民以报神”。“若果某等贪财害民，欺上罔下，伏惟明罚其身，以惩不职，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 年 11 月第一版，135 页。

无徒重为灾害，以苦无辜之百姓也”^[1]。如果真的是我自身施政的问题，宁愿神明惩罚自己，也不要苦了无辜百姓，这充分体现了儒家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因为，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关注的是民生，他们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2]，他们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

此外，地方官员也利用自身权利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东镇沂山神信仰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就是明朝成化副都御使莆田翁世资所记载的《东镇沂山寝庙成记》中修建东镇神灵寝庙的事情。明成化六年，翁世资同藩皋群邑之长吏叶冕、李裕、李昂等因为祈雨祭拜沂山之神。礼毕后，“登殿见神设像于右，而其左侧则设女神之像以配焉，并坐南向”。翁氏认为，既然明太祖朱元璋已经以山水本名称之为东镇沂山之神，作为自然之神，作塑像以祭之已经于礼不和，更不用说以女神相配了，这实在是对神的亵渎。与翁同行之官员李昂认为：“礼之所以明神人、正名分，去其女神礼则正矣”，但是唯恐乡民不能认同，于是采取折中之法，“莫若列创寝庙，移其女神于后，庶上不失典礼之正，下有以顺愚民之心”。翁世资对此非常赞同：

窃惟事神之道正礼为先，礼正则名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神安矣。典礼不正则言不顺，以之治人且不可，况事神乎！……矧沂山为东镇祀典之神，其事之不经如此，吾惧神常加怒于知礼之有司，又肯安于渎礼而致其羞乎！^[3]

由此祭文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对东镇沂山神的祭祀已经牢牢打上了儒家礼制观念的烙印。东镇沂山之神作为自然之神本不应该有女神相配，但是在前代已配之女神的情况下，为了与礼相合，只能分置两室。因为在儒家传统礼制观念中，“男女授受不亲”，礼记中记载“男女不杂坐，不同橧枷（衣架），不同巾栉，不亲授”^[4]。

明代东镇沂山之神是国家山川神灵中的重要角色，这个角色身上不仅有国家赋予它的仪式性的象征意义，也有众位儒家士大夫官员赋予的遵循礼制，以民生为本的现世性精神，这让东镇沂山信仰更加贴近民众生活，更有利于其在民间的传播。

由国家对沂山神的祭祀来看，东镇沂山之神首先是自然之神。它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媒介。这种观点多次在祭文中得到表述。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因战事而祷告的祭文中有“然予未敢径告上帝，惟神鉴之，为予转达”，永乐四年（1406年）“万冀神灵鉴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35页。

^[2]（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五，中华书局，2004年。

^[3]（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2页。

^[4]吕咏楷等著，《礼记全译孝经全译》（修订版），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三月第一版。

予诚悃，闻于上帝，赐予鸿庥，潜消瘴疠”^[1]。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沂山之神只是作为媒介存在，但是明代对沂山神的官方祭祀中，一直都表现出对神的敬畏，表现出一种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在正式祭文之前，致祭人员宣告“惟某年某月某日某干支，皇帝遣某官员告知东镇沂山之神”，在正式祭文之后，多有“惟神鉴之，伏惟尚飨”等字眼。虽然篇幅较短，但是这体现了与神之间的交流是相互的，是对话性质的，通过这种交流希望得到沂山之神的庇佑与保护。在正式祭文中，往往是详细的阐明祭祀的原委，使神灵能够了解到祭祀的目的。在诸如战士出征或者祈福消灾一类的祭文中，致祭者都非常的虔诚，多次哀祈于神，祈求神之鉴知。当然，祭文中也表达出了强烈的取悦神的信息，不断赞美沂山之神，但是这种赞美也多建立在对神有所要求的基础上。这种取悦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的，表示出对神的控制。

作为仪式之神，对东镇沂山神的祭祀宣告着中央皇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明初，朱元璋便规定，“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皆为淫祀，民众不可致祭”^[2]，牢牢地将祭祀权控制在国家手中。因而，皇帝每每于登极时派大臣致祭沂山，实际上是透过祭祀这样一个仪式，反复昭告作为祭祀主题的皇帝身份，这个身份是上天授命，是不容置疑的。从而在民众之间不断强化，最终得到民众的认可。同时，对沂山之神的祭祀也宣告着该地区是属于中央的统辖范围内，中央对此有着绝对的统治权，在此种意义上，沂山之神成了国家在该地在场的代表，它代表着国家监督地方官员，确保其政治举措是合乎中央期待的。

除此之外，东镇沂山之神还可以兴云降雨、排忧解难。东镇沂山祭文中很多都是关于农业和民生的祈福消灾的内容，祈雨、驱蝗或者祈雪都表现出致祭者代替民生期望得到保护的愿望。成化十三年（1477年），地震频发，瘟疫横行，皇帝遣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陈俨致祭东镇之神，“国家敬奉神明，聿严祠祀，所期默运化机，庇佑民庶。乃近岁以来，或天时不顺，地道欠宁，或雷电失常，雨旸爽候；或妖孽间作，疫疠交行。远近人民，频遭饥馑，流离困苦，痛不可言，惕然于衷，罔知攸措。惟神奠镇一方，民所恃赖，覩兹灾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币，遣官祭告，尚冀体上帝好生之德，鉴予忧悯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阐威灵，捍患御灾，变祸为福。庶几民生获遂，享报无穷，惟神鉴之”^[3]。此祭文在求福消灾的同时，还指出沂山之神坐镇东方，如果不能为民解忧，神明内心也应该愧疚不安。在此类祭文中，不再单单把沂山之神看作高高在上的自然之神、仪式之神，更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8页。

^[2]（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7页。

^[3]（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28页。

应该是体谅民生疾苦，为民众谋福利的有思辨能力的神灵。

小结

通过本章论述可知，明代是沂山信仰的鼎盛时期。明初，出于加强统治的需要，朱元璋下诏去除岳镇海渚封号，恢复去自然神属性，国家对岳镇海渚的祭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此情形下，沂山作为五镇之首，受到明王朝的格外重视，仅明一代，除去国家对沂山的常规祭祀，遣使祭祀沂山就达四十八次之多，致祭原因多种多样。另外，当地官员自发祭祀沂山、国家和地方政府修缮东镇庙的次数、东镇庙碑林的明碑数目均为历朝代之最，这足以看出明王朝对沂山祭祀的重视程度。除此之外，从明代对东镇庙的九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以上所述，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有力的材料和依据。

第三章 明代沂山信仰的地方化

古代国家对包括镇山在内的名山大川的祭祀权的绝对控制，是依照“国主山川”的原则，通过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权来彰显其天子身份，维护其自身的特权，昭示其独一无二的统治权力。至于明代，由于统治阶级对山川祭祀的推崇和控制，使得镇山神灵的权威性日渐增高，无形间对广大民众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广大民众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以地方和民间的形式对镇山进行祭祀和信仰活动，不断衍生出新的镇山信仰方式。明代国家镇山祭祀开始走向地方社会，并且呈现出民间化的发展趋势。

一、民间力量对国家镇山祭祀的渗透

镇山祭祀属于国家正祀的范畴，是由统治阶级牢牢掌控的，并全力禁止民间淫祀对国家祭祀体系的渗透。但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民间力量始终没有向封建国家屈服，在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是明代镇山信仰如火如荼的发展浪潮下，民间和地方力量也在国家主导的镇山祭祀中找到了突破口，介入到了其倾心已久的国家镇山祭祀活动中。

1、民间资本对镇山祭祀的渗透

在对国家镇山祭祀的渗透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民间资本对镇山庙宇建设的参与。这里提到的民间资本包含民间财力和劳力两大方面。由于战乱或年久失修等原因，镇山庙经常出现损毁，修复镇山庙的工作按照惯例应由国家委托地方政府来完成，而地方政府又往往因为财力等原因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这就给民间的财力以可乘之机。比如，嘉靖年间沂山东镇庙的重修过程中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当地民众很快时间内就集聚了几百两白银，用来资助府衙重修东镇庙。对此时任兵部左侍郎邑人迟凤翔在《临朐县重修东镇庙记》中写到：

民甚苦于供役，及思一劳永逸之图，公私俱竭，计无所出。岁至戊辰，政善民和，因而岁稔，乡耆陈鏊辈请愿助工以拓神居。尹愜夙心，即为允之。乃选殷实好义如马讲辈者鉴视厥事。维兹胸庶，比比乐施。不月余登助籍者几四百金。^[1]

除此之外，万历八年《重修委粟山东镇行宫记》中也有类似记载：

嘉靖以来，日就圯废。邑人后山魏公率众重修，胜旧制不啻百倍，而横栏卷厦以及周围石垣，则前此所未有也。工成当纪之石，顾石具而魏公不禄……魏公此举，君子以为非默矣。纪而述之，余得以寡昧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32页。

辞哉!是举也,托始于万历庚辰春三月,落成于明年秋七月,总计所费不下七十余金,厥工亦不细矣,踵而修之以永其传,又宁无望于后来者乎!诸出资协赞者,则列其名氏于碑阴。^[1]

除了资金以外,民间的劳力役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建造沂山东镇庙的过程中,木材取自沂山,石头凿于荆山,琉璃取自颜神山,但这些都要通过民众的劳作才能建造出来。

“岁至戊辰,政善民和,因而岁稔,乡耆陈镗辈请愿助工以拓神居。”因而“夫庙居深山穷谷,夙昔林木蔽野,居民丰足。故材取于山而有余,力出于民而甚易。”

2、地方知识分子对镇山祭祀的渗透

文人墨客通过其所作诗词歌赋对名山大川的赞颂和传播,也是民间力量向国家镇山祭祀渗透的一个重要方式。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大文豪都曾在沂山留下墨宝。

明清时期的临朐冯氏是临朐当地官宦和文化世家的显赫代表。在这个家族中,产生了进士八人,举人、贡生多达十数人,拥有世代传承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品格。其中明代有名的散曲、戏曲作家代表冯惟敏(1511-1578),字汝行,号海浮,又号石门,其写有《御祀东镇》一诗。

重华巡狩四时游,十二山川十二州。

敕使御香分道出,我皇端拱事玄修。^[2]

地方文化名人孟养性所作《游沂山记》中也提到,嘉靖辛酉(1561年)九月他在带领弟子于东镇庙读书时,他的好友王子仰慕沂山美名,慕名而至,与其同游沂山,质明谒神。可以说,地方知识分子对于弘扬沂山的知名度有着重大作用。

区别于国家性的镇山祭祀的计划性与政策性,民间力量对于东镇沂山信仰的参与是自发性的、比较随意的。但是随着东镇沂山信仰传播的不断深入以及东镇沂山行祠的建立,民间力量对于镇山信仰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东镇老爷”信仰在民间的深入传播。

二、沂山神灵消灾解难的传说

东镇沂山位于齐鲁文化腹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间流传的很多关于沂山的传说都是出于对名山大川的敬畏与崇拜之情。这些传说大部分都是关于东镇沂山神的义行事迹,赋予他的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护民爱民的人格和特质,在进一步增添沂山的神秘感和崇高度的同时,使得沂山神信仰快速的融入到青州府以及临朐当地的民间信仰之中。

^[1] (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35页。

^[2] (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0页。

沂山东镇庙的建立之初，便有许多关于沂山神显灵的民间传说记载，这也是沂山神进入民间信仰体系的一个重要表现：

世传昔有傍山父老，议建庙宇大关南垂，榱栋已具，忽夜风雨，其材俱自徙于陵阿中，父老因之成庙。

壬寅（1662）夏，本庙道人有曹左雅者，佣人绩土，忽闻门外大驾声到，相与出视之，杳如也。旋一掘地，取得灰迹，……计得灰四千余斤，施诸涂暨则可敌八千斤之用。

山半有东镇东安王庙，石刻神像，俗传赵太祖微时阅韩通，于此弃衣而石翁媪收之，神像犹作臂衣之形，固又云翁婆庙，本即沂山之神。^[1]

石翁媪传说的另一个产物就是翁婆庙的出现，正如传说中所说，翁婆庙是对东镇庙的别称。对此，清人冯应榴所辑《苏文忠诗合注》中也有相关的记载：“青州其山镇曰沂山……汉武帝所封之东泰山也，山半有东镇东安王庙，石刻神像又名翁婆庙，即沂山之神，历代封祀有典查”。翁婆庙因传说而得名，是民间对沂山传说进行演绎的结果，它并非区别于东镇庙的新庙而是民间化的沂山神东镇庙，它更加贴近民众，是镇山祭祀向民间信仰倾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沂山附近民众之间，也流传着一些沂山神显灵解救人们苦难的传说：

嘉靖丙辰，巨寇赵慈等恃强为乱，四方亡命之徒翕然从之，远迹震惊，莫敢谁何。未几，将攻朐邑。先期乞签于东镇祠下，连得下下者三。寇怒，不谢而去。不十里遇官兵于大关，南风忽起反而北，兵刃既接，寇众大败。及得渠魁，讯之则曰：“我辈临阵时，初不知有官兵，第见左右前后皆凛凛然伟丈夫，与镇庙中神像无异，以故败至此耳！不然，吾辈岂若等所能制耶！”寇既慑服，于是见者闻者莫不骇且愕焉。以为东镇之灵应，果不负国家崇祀之意云。

弘治、正德年间，沂山有一虎，猛不可撓。每瞰妇人童子往来山下，辄攫而食之。居人深以为患。一日，有父老数十辈俯伏庙下哀祈于神曰：“神血食一方久矣，今猛虎为患，可无以驱之？”越翌日，虎自山上投下而毙，若有人迫之者。呜呼！异哉！^[2]

明代沂山神灵既可以帮着灭寇，还可以伏虎，因而当时沂山附近的民众认为既然沂山神接受人们的祭祀和供奉，那就应该起到其作为保护神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沂山神信仰在民间普及并逐渐民间化的重要体现。

此外，明代东镇沂山神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身份、地位的人格化的神而存在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因出兵平叛、新皇登基、水旱疾病等对其进行的多次祭祀，使得沂山神在当地

^[1]（元）于钦纂修，（元）于潜释音，（清）周嘉猷考证，《齐乘》，卷之一，山川上之沂山。

^[2]（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0页。

民众心目中不再仅仅是享用国家祭祀的仪式之神，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人格化主体而存在，它不仅可以兴云致雨，还可以消灾解难。这也对沂山神的民间化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三、大量东镇行祠的出现

周边地区大量东镇行祠的出现，也是东镇沂山信仰民间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的出现，打破了每一方镇山只能有一座寺庙以供国家祭祀使用的定制。而东镇行祠的性质应该完全是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它是为了方便当地百姓对沂山神的祭祀和崇拜而出现的，这也是对冲破国家禁忌的一种灵活转变方式。

当然行祠出现的原因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便，《周礼·职方氏》：“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1]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当地民众要去祭拜沂山神，祈求沂山神的保佑就显得比较困难，而行祠也就应运而生。

《东镇沂山志》中记载：

于临朐城东北三里处委栗山有东镇行祠一座，最初修建于元代延佑二年。该神庙以前为公婆庙，年久失修，趋于简陋。于万历年间由邑人后山魏公率领民众重修。

明万历年间临朐知县邓鹤作有《重修委栗山东镇行宫记》：

余惟天下镇神其凡有五，南曰会稽山，西曰吴山，北曰医巫闾山，中曰霍山，而东镇则沂山是也。沂山在朐之城南百余里，前代封东安公，又封东安王。我太祖高皇帝嫌其不经，诏削去之，称东镇沂山之神……庙在山侧，足称伟丽，第去城既远，往返维艰，祷雨祈晴，非行宫何以哉！^[2]

由记载可见，栗山东镇行祠的建立是因为此地距离东镇沂山庙甚远，往来不便而设。其主要功能是方便当地民众祷雨祈晴，以作农事求助之用。

沂山神信仰在临朐周边也是分布十分广泛。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营建志中记载之所以修建东镇庙是因为：

惟神坐镇东方，函香匡帛，锡自朝廷，兴云出雨，民生攸赖，巍峨耸秀，不远郊，庶几藉兹威灵以慑服群动，推望秩之余意，生黎黍之纠虔。^[3]

故而于青州府建庙。而关于此庙在青州府的位置，《嘉靖益都县志》记载位于府城东

^[1]周礼·夏官·职方氏，夏官司马第四。

^[2]（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5页。

^[3]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三，营建志上·东镇庙。

门楼。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博兴县条中记载：“东镇庙，在城南同光寺，久废”^[1]。而东镇行祠在各地的名称也有不同，有的称东镇行宫，有的称之为平王庙。在清代《潍坊昌乐辛展重移修平王庙记》中记载道：“辛展平王庙也有来久矣，自乡老曹苑、张郑之流就沂山东镇李祠上创建行宫于辛展之地，迄今逾百载矣……为东方之雄镇，虽国家岁时之祀未尝阙焉，况士庶之俦何堪怠哉”^[2]。

这里所说的平王庙显然是民众对东镇封号的演绎而来的一个名称，而不是另外一个庙，是与东镇庙、东镇行祠等一样的庙，而且“迄今逾百载矣”，这说明明代应该就有了平王庙。祭祀的神灵基本都是人格化的沂山神，但是也有例外的存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安丘县词条中记载：“东镇行宫，在小东关，祀汉寿亭侯”^[3]。此地的行宫中祭祀的竟然是汉寿亭侯，换句话说，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汉寿亭侯关羽就是沂山神。广大民众自主的决定了他们所崇拜祭祀的形象。此时，沂山神信仰，完全由当地民众所创造，他们成为了沂山神民间信仰的主宰。

东镇沂山神信仰在民间非常广泛，而且程度比较深，这也说明了民众对国家镇山祭祀的渗透和参与的逐步加深，二者相辅相成。



图 3-1 东镇行祠在周边地区的分布示意图

^[1] [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二百六十六《青州府部》，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一版，第6页。

^[2] [清]端方撰，《陶斋藏石记》卷三十九《潍州昌乐辛展重移修平王庙记》，宣统元年石印本，第1232页。

^[3] [清]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二百六十六《青州府部》，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一版，第6页。

四、东镇庙会的兴盛

每年的四月初八，是东镇庙春季庙会开始的日子。沂山庙会，又称沂山香火会。当地百姓，对“东镇老爷”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它特别崇拜与敬畏。东镇老爷在沂山周边地区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等级极高，仅低于玉皇大帝。有的地方为了方便供奉，还在本地建起了东镇行祠。每到东镇庙会日，四乡百姓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都赶到沂山脚下的东镇庙去赶会，因此，东镇庙的庙会特别隆重，影响也特别大，有的甚至从数百里外前往赶会。

在宋代之前，每年一次在东镇庙祭祀山神。宋代后国家逐渐改为每年春秋两祭，春祭3天（自农历四月初八始），秋祭5天（自农历十月一日起），以后沿袭未变。但是在老百姓的心里，春季庙会更容易得到认可。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民间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对于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百姓而言，是游山的好时节。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四月初八，是民间传统的“活佛节”。活佛节，又称龙华会。传说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佛教信徒以水浴佛，形成礼仪。它始于汉魏，起初流行于江南吴地，到唐宋时才遍及全国，成为僧众和佛教徒们的节日。在沂山演变成东镇庙庙会，一方面说明了在民间佛道不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历史上的毁佛运动，使沂山形成了道教一统的格局。如唐末的会昌法难，沂山朝阳、凤阳、普照诸寺无一幸免，宋初建东镇庙，就建在凤阳寺的遗址上。当地普通民众一向是不问佛道，见庙就拜。自有了这座东镇庙，已经成为习俗的四月八活佛节便自发地集中了过来。

一般而言，庙会期间，附近群众云集，沂水、安丘、昌乐、莱芜、蒙阴等地信徒前来进香，商贩设摊贸易，人山人海、宛如闹市。到明代，东镇庙会达到了鼎盛。据史料记载，当时东镇庙规模宏大，仅仅住庙的道士就达100多人，而庙会当日，周边各县区临朐、青州、安丘、沂水等地的百姓聚集到沂山，有时会达到几万之巨，庙会时间短则3天，长则达到5至10天。他们齐聚东镇庙，在这里祈祷、祈福、烧香、祭拜、唱戏、游艺、叫卖、交易，使得东镇庙庙会从一开始单纯的祭祀活动，一步步演变成为了文化往来、经贸交流的场所。

历代臣民拜求东镇神灵、集会东镇的首要目的乞望神灵保佑。在较为落后的农村山区，人们于自然变化面前无能为力，天灾人祸时有发生。明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镜刻的碑文记载，“成化六年，庚寅，自春徂夏不雨。二麦焦枯，三农造匱，于叨巡抚以安养兵民为务，乃斋沐蠲吉、率藩臬郡邑之长叶宽、李裕、李昂等躬谒于神，以祈求雨，以谷士

女”^[1]。可见，古人祭东镇的目的是消瘟避灾，祈神保民。另外，在生活中的许多不如意之事也需要一定的思想寄托，每年来神灵面前祭祀一番，便可得到心灵的慰藉。因此，四月初八这一天，除了拜祭东镇老爷之外，许多善男信女更是来到沂山拜祭有着送子观音之称的碧霞元君祈求子嗣，参加庙会的人们都不放过这个与神灵沟通的机会，竭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东镇庙会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沂山地区其它信仰的发展。

其次，农历四月初八，正是农闲季节，且天气寒温适中，恰是郊游的大好时节。因此，赴东镇庙集会，可以满足人们休闲游乐的要求。四处百姓乘此机会游览沂山的秀丽风光。同时，庙会上更有说书唱戏、吹拉弹唱之事，足能使人精神振奋，心情愉悦。

再次，东镇庙会还担负着集市贸易的功能。参加庙会的首先是沂山周边村庄的村民，他们交通方便，借助沂山的自然环境，将本地的土特产品，如药材、木材、家畜、野味、皮毛、农产品出售。此外，更有来自周围县区的百姓。他们可将各地的新鲜资讯带到庙会，为人们进行经济交流提供了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庙会本身也需要大量的物资贸易，诸如供品香纸，小吃冷饮等等，一日之内便有大量交易。这为当地的商贩带来了发财良机。

明代沂山庙会之所以兴盛，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对沂山的不断加封祭告，使得沂山神在百姓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沂山神的灵验与否有很大的关系。通过一次次沂山祈雨的灵验，沂山神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保护当地农业生产、安境保民的人格神形象。而繁荣的沂山庙会，不仅为周边地区互通有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所，体现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内涵，更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提高了沂山神信仰在整个青州府及周边地区的知名度，有利于该信仰在当地的传播。

小结

由于国家对镇山祭祀的严格控制和对民间淫祀的打击，使得民众对镇山祭祀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大民众纷纷以各种形式渗透到镇山祭祀中。其中，民间资本的介入、地方知识分子的传播、沂山神灵的神异传说、大量东镇行祠的出现，以及东镇庙会的兴盛是明代沂山地区信仰地方化和民间化的重要途径。沂山信仰的地方化和民间化，体现了当地民众积极参与到沂山祭祀中的强烈愿望，沂山信仰在地方力量不断渗透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1]（明）王居易，《临朐县旧志续编》之《东镇沂山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42页

第四章 明代沂山信仰与其他信仰之关系

一、明代沂山信仰与道教的关系

1、明代之前道教在沂山的发展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东周时期的方仙道门，融合了各种神仙方术并推崇多神信仰。发展初期多流传于民间，直到隋唐以后才受到统治者赏识，其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祭典中道教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些比较重要的祭典活动都由道家来主持。慢慢的它也渗透到国家的镇山祭典中。从历史记载来看，道家不仅仅早就在东镇沂山落地生根，更从国家权力统治中心直接参与了国家有关镇山祭礼的制定和仪式的执行，它还借助国家权力参与到东镇沂山山神庙的庙制管理中来，将镇山神庙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汉书《古骈邑·东小泰山篇》曾有记述说，汉武帝时期，有一名方士名叫安期生，是秦汉时期非常著名的修道者，后被尊称为北极真人。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时，他的弟子李少君来到临朐传道，起先居于石门山，后来转至沂山朝阳洞，在那里炊炉炼丹，弘扬道术。附近的乡民都慕名到这里来求丹问道，一时间风头无两。后来汉武帝广招天下方士以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李少君才离开了东镇沂山，奉帝诏到长安去了。虽然李少君离开了临朐，沂山上当时也还没有修建宏伟壮观的道观，但是沂山适合修道，山中石洞乃方士炼丹的宜居之所的美名却传播开来，许多传道方士都相继赶来，在这里修道。

东汉末年，天师教教主张鲁派方士张丹到青州弘扬道义。张丹到达青州后，先是在青州（当时称益都）住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正是东汉末年社会混乱不堪之时，时常有战火发生，青州城内并不安定，不适宜修道。张丹遵循了李少君的路线，也往东到达沂山，于朝阳洞设立法坛，宣扬自己的信仰——五斗米教，在这一时期，他还在沂山上修筑了“朝阳观”，作为宣道之所。朝阳观的建立是道教在临朐乃至青州的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是道教在临朐也是青州的第一座庙观。但是因为五斗米教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所以遗憾的是，到了曹魏年间，这座道观就被拆除了。

北魏时期，道教发展步伐加快。相传北魏太武帝时期，北天师道道主寇谦之自河南嵩山到山东传教，曾到沂山。寇谦之是北魏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他后来被太武帝尊为帝师，用道治国。可以说寇谦之如果真正来过东镇，必然对沂山地区乃至临朐道教的发展意义极为深远。

隋代开国后,隋文帝下诏册封东镇沂山时,同时命人建造东镇庙,但当时是否有道士居住,尚未可知。到了唐代高宗时期,对汉武帝时修建的泰山祠进行了重修。此外,在沂山上还流传着八仙道人吕洞宾到沂山传道的传说。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于建隆三年(962年)下诏把东镇庙迁址至沂山下九龙口凤阳寺处,大兴土木,修筑庙殿。这一时期,道教得到官方的支持,逐渐兴旺,表现在道士开始参与到国家祭祀之中。光绪《临朐县志》卷九载沂山东镇庙有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的《沂山设醮记》碑,张从训撰文,道士吴太昭书石。如果吴太昭是东镇庙道士,那么最晚到宋仁宗之时,东镇庙就有道士居住并参与了国家的祭祀东镇沂山活动。

在金代,出现了东镇庙有明确记载的第二个道士杨道全。据《元史》记载:

大定四年,礼官言,岳镇海渚,当以五郊迎气日祭之。诏依典礼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庙致祭,其在他界者遥祀……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明昌间,从沂山道士杨道全请,封沂山为东安王,吴山为承德王,霍山为应灵王,会稽山为永兴王,医巫闾山为广宁王。^[1]

东镇庙现存《元至治二年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碑》也提到了杨道全为东镇庙知庙道士。同时这一时期,全真道在沂山地区也广为传播,查证史料,可知刘处玄、马钰、丘处机、王处一、周庆安、李志清等全真教高道都曾在沂山周围的青州、安丘、潍州、莒州、密州等地传道。这些地区或在沂山周边,或离沂山不远,而此时东镇庙作为道教在该地区的道教宫观,必是十分兴盛。

到元代之时,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信奉,道教发展迅速,道士人数猛增。东镇庙现存碑刻如《元至大四年临朐县达鲁花赤春记碑》、《元皇庆二年脱欢、蔡文渊昭告碑》、《元延佑六年残碑》、《元至治二年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神佑宫记碑》等一共提到道士26人。而《宣统山东通志》也提到在元代,东镇庙住持是由两位道士担任。

2、明代沂山道教的发展

至于明代,道教由于受到国家政策和统治阶级的影响,经历了由压制、松动、萎缩、复苏的发展过程。沂山作为东镇之首,历来受到明王朝的重视,国家致祭非常频繁,因此可以作为明代道教发展的一个缩影。

明朝建立之初,国家曾颁布了大量的限令来控制佛道两教的发展。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归并寺观,“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

^[1] 《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二十六史,1414页。

事”^[1]；二十四年（1391年），下令“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初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道教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对宫观的数量和道士的人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等。但是沂山作为五镇之首，国家祭祀十分频繁，道教在沂山得以快速发展，使得东镇庙得以留下了大量的碑刻，虽经多次损毁，但至今仍然有几十块之多，数量为各朝代之冠。我们通过这些碑刻资料可以得知很多东镇庙的道士的情况。为了便于分析，现将部分碑刻作为表格如下：

东镇庙碑目	守庙道士名字
《明洪武二年敕修东镇庙记碑》	太虚宫守庙道士王德祚、郑德明
《明正统元年车逊致祭残碑》	道会司道士王道延，守庙道士李寿真、李元真
《明正统二年任荣祭告残碑》	道会司道士蒋□深，守庙道士李寿真
《明景泰四年戚澜代祀碑》	道会司道会刘得芳
《明天顺年间残碑》	道士姜志先
《明成化元年李木代祀碑》	神佑宫住持崔守诚、道士赵志安，道会司道会鞠得芳
《明成化三年重修东镇庙记碑》	守庙道士李原真，本庙住持王志琮，道士赵志安、赵志雄、董志海，化缘道士李喜延
《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	本庙住持崔守□
《明成化十三年陈俨代祀碑》	住持张永惠
《明成化二十三年黄景代祀碑》	住持道士孟喜升
《明弘治七年李兴致祭碑》	住持宋喜文，道士成喜通
《明正德五年乔宇代祀碑》	住持郭崇增
《明嘉靖三十二年沈应龙致祭碑》	本庙住持刘成

表 4-1 明洪武至嘉靖东镇庙道士表

^[1] 《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中研院史语所，第 1523 页。

^[2] 《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九，中研院史语所，第 3083 页。

东镇庙碑目	守庙道士名字
《明嘉靖四十年重修东镇庙题名记碑》	住持崔崇佑，道士陈崇进，募缘住持唐教玉，助缘杜教用、郇一林、王教洪、李教允、孟道胜、申道贵
《明嘉靖四十三年鲍象贤致祭碑》	本庙住持唐教玉
《明隆庆三年张体干颂东镇诗碑》	本庙住持崔崇佑

续表 4-1 明洪武至嘉靖东镇庙道士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东镇庙所存明洪武至嘉靖年间十六块碑刻中一共出现了 36 位道士，减去出现两次的李寿真、赵志安、崔崇佑、唐教玉 4 位，实际上有 32 位道士。其中还有尚且不确定是否是东镇庙道士的道会司道士 4 人、太虚宫道士 2 人，所以真正可以确认是东镇庙道士的只有 26 位。这与元代东镇庙碑刻的道士题名相比，数量明显减少，而且从他们的字辈关系上面很难确定有师徒传承的关系。究其原因，这也许与明朝朱元璋所实行的并归道观，限制道士数量的政策有关。

而上表《明成化元年李木代祀碑》、《明成化三年重修东镇庙记碑》所示道士题名明显增多，这说明宪宗成化初年，统治者对道教的政策开始出现了松动，逐步放宽了对道教的限制。而到了明孝宗、明武宗时期，鉴于成化年间放松宗教政策所带来的弊病，又开始收缩政策，加强对道教的控制，这一点从《明弘治七年李兴致祭碑》和《明正德五年乔宇代祀碑》中道士题名急剧减少可以看出。到嘉靖年间，由于明世宗崇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使得明代对道教的政策得到了松动，道教开始复苏。

而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和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东镇庙的道士数量明显增多，而且传承清晰、宗派明确。这一点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

碑目名称	道士名字
《明万历十四年唐教玉墓碑》	度遣徒子：徒孟道胜、雪道之、申道贵、吕道胸、姚道江、俗徒子侯道夫，徒孙杜守仁、方守田、申守政、付守智、杨守仁、徐守衫、田守俸、杨守□，既重孙牛悟性、于悟贤，玄孙申玄机
《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	住持道士吕玄阳、张演随，宋全科。本庙道人：王道蓬、王道真、申玄机、张真绪、邵守清、徐守衫、杨悟清、崔演器、杜惟宦、张守存、马全守、李教花、夏全钊、张悟全、聂全傅、班演化、尹演儒、高真和、曹真惟、崔惟训、吕演文、孙真宁、赵演爵、朱演贤、白全德、田惟臣、户演香、周守明、赵守身、张守文、王颜冲、朱真先、王奉冲。

表 4-2 万历年间东镇庙道士名字列表

从表 4-1 和表 4-2 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期出现了一位对沂山道教至关重要的人物——唐教玉。他不仅参与了嘉靖四十年东镇庙的重修，而且后来作为东镇庙的住持执掌东镇庙。而从表 4-2 两篇碑记中道士的字辈传承又完全符合邱祖又派，且唐教玉墓碑碑文显示其徒、徒孙、玄孙等字辈与邱祖又派的字辈与邱祖又派开派之初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难得出唐教玉就是邱祖又派开派祖师的结论。具体的辩证过程在此不做论述，详见赵卫东《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而从《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中我们可以看出，东镇庙道士并非全是邱祖又派，同时也有其他派别存在。其中“演”“全”“惟”“教”“冲”应该是属于华山派弟子。根据现存清康熙十六年以后的碑文可以得知，邱祖又派与华山派道士混住东镇庙的情况一直到民国二十九年还是如此。

随着镇山信仰与崇拜的不断发展，宋代以后到清末，在以东镇庙为道教中心活动场所周围，先后设立了“玉皇阁”、“碧霞祠”、“关帝庙”、“三元庙”等更多的道教活动场所。沂山也成了方圆数百公里范围之内的道教活动中心。

二、明代沂山信仰与佛教之关系

东镇沂山曾经是青州地区的佛教朝拜中心，历朝历代修建了许多寺庙庵观，其中较大型的就有 20 余座，这些大型寺院的存在，使得沂山地区的佛教信仰非常的兴盛。

查阅文献资料得治记录的最早的佛教传入沂山是在于清代仰沂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中：“前汉孺子居摄二年岁次丁卯，川人释子王静，由巫山来东海青州传教，先寓仰天，越年，南去东镇沂山，居极巅玉皇顶泰山祠”^[1]。到东汉时期，佛教由于社会的日趋稳定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到明帝永平年间，佛教弟子法规在沂山附近各县区广泛传播佛教，信众大增，最多数以万计，而且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到元和年间在沂山东麓修建了一座当时青州府唯一的一座大佛寺---法云寺。虽然法云寺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在青州府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当时该地区的佛教中心。

从西汉末至东晋二百余年间，佛教日益受到官方的重视，信众也越来越多。据《古骈邑》载“释门历经四朝，僧徒日增，众至六十，……古刹‘法云’，朝拜若市”^[2]。由此可知沂山的佛家兴盛。明道寺也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由于皈依佛教、求拜佛法的人越来越多，法云寺的规模不能满足需求，法云寺住持便于东晋咸安元年在沂山瀑布谷东口，汉水北岸建造了新寺---明道寺。随着新寺的建成，沂山佛教的活动中心也迁至山下。至于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信奉，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明道寺也多次经过修缮和增扩，《东镇述遗记札》载“明道寺大竟数十亩，面临汉水北靠凤凰岭，左毗官道，右依镇山，寺钟山音回荡，香火升腾云烟。每至朔望，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3]。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明道寺在当时的规模之宏大和信众云集的盛况。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沂山的佛教寺庙如明道寺、法云寺也经过不断修缮和增扩，而且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柳泉寺、朝阳寺等。北朝后期，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禁佛、道两教，在这次所谓的“建德法难”中沂山的寺庙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其中白玉庵、柳泉寺遭到拆毁，其他寺庙的僧尼还俗过半。

到隋朝，因为统治者的态度，两教得以复兴，重建了沂山白玉庵，并且增扩了明道寺，还在沂山西麓天齐湾畔新建龙湾寺。至唐代，佛教极为兴盛，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沂山又建凤阳寺。周武氏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遣使修沂山寺院，增修青竹庵。代宗大历初，又在沂山大凿佛石屋八十余座，还于大山悬崖广雕摩崖造像数十处，共两千余尊。唐末，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845年）八月，敕令拆除天下佛寺万余所，还俗僧尼几万人，这次毁佛，即是历史上所说的“会昌法难”。此次法难中，明道、朝阳、凤阳、柳泉、光恩五寺及白玉、清竹二庵均遭拆毁。捣毁铜、铁、石、木、陶、泥造像余躯，还俗僧尼众多，仅留法云寺，令老病无归的僧徒看守。此后历经各朝，沂山佛教逐渐由盛及衰，寺院建筑也无较大增加。至于明朝，由于佛教不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导致日渐衰落，

^[1]（清）赵守身，《东镇述遗记札》，临朐县旧志汇编。

^[2]抱石堂主，《沂山十记》，载天涯论坛之东镇书院，<http://bbs.tianya.cn/post-151259-24-1.shtml>。

^[3]山东沂山之宗教文化，作者不详，<http://hk.plm.org.cn/gnews/2011428/2011428230040.html>。

仅剩法云寺一座孤庙。

因此，作为中国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尽管在沂山发展较早，但是因为受到政治与时局的影响，却难以为继。

小结

东镇沂山信仰、道教信仰、佛教信仰可以说是三个源流不同、信仰主体不同、教理不同的三个完全独立的信仰体系，但是在东镇沂山，这三种信仰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自隋文帝建庙立制伊始，道家就一直是东镇庙实际上的主管者，又到东镇沂山之神有了具体肖像，成为独立的有血有肉的信仰对象，这种权力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可以说，东镇沂山信仰早就深深打上了道家的烙印。皇家祭礼使东镇沂山扬名齐鲁，更是吸引了众多的佛道子弟来到沂山，把这里看作炼丹修法的灵气宝地。可以说，正是在佛道二家信仰的影响下，东镇沂山信仰才更富内蕴，更有魅力。

第五章 明代沂山信仰对后世的影响

纵观沂山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是沂山信仰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从国家对沂山的重视程度、地方官员祭告沂山的次数、还是周边百姓对沂山神的崇拜程度都可以看出。而清代明之后，沿袭旧制，继续祭祀岳镇海渎。但是其祭祀规模远不足以比拟明代。

与元明之际一样，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使得岳镇海渎的祭祀暂时废弛，但很快得到了恢复。清代最早的岳镇海渎祭祀见于《清史稿》卷八十三《志》第五十八：“顺治初，定岳、镇、海、渎既配飨方泽，复建地祇坛，位天坛西，兼祀天下名山大川”^[1]。而清代也沿袭了元明两朝的遣使致祭制度，不过略有不同之处，清顺治三年（1646年）：

定北镇、北海合遣一人，东岳、东镇、东海一人，西岳、西镇、江渎一人，北岳、西海、河渎一人，南镇、南海一人，南岳专遣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遣使祭祀制度不再简单的分为五道，而且祭祀使臣出发之前需要茹素，并且实施叩拜之礼和三献礼。

但到康熙年间，分道遣使制度废止，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才得以再次恢复。《清史稿》卷八十三《志》第五十八又云：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为元元祈福，始遣大臣分行祭告，凡岳五：曰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镇五：曰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海四：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渎四：曰江渎、淮渎、济渎、河渎^[3]

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首次遣使祭祀沂山至光绪元年（1875年）止，一共有40多次。清光绪《临朐县志》卷十六《杂记》有详细的记载：

沂山祭告之使，明代最繁，就其可知者，书之以……国朝遣祭尤多重臣。顺治八年，礼部右侍郎刘昌；十八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敬祖。康熙六年，内秘书院学士刘芳躅；十五年，宗人府府丞马汝驥；三十五年，内阁学士张榕端；四十二年，内阁侍读学士赵世芳；五十二年，吏部左侍郎孙柱。雍正元年，宗人府府丞吴梁；十三年，翰林院侍读学士伊尔敦。乾隆十三年，登莱青道赵晃；十五年，内阁学士归宣光；二十年，内阁侍读龔学海；二十七年，吏部右侍郎恩丕；三十七年，吏部左侍郎曹秀先；四十一年，内阁学士汪廷屿；四十五年，内阁学士达敏。嘉庆元年，青州副都统观明；二十四年，刑部左侍郎廉善。道光九年，登州镇成玉；二十五年，登州镇德佳；三十年，青州副都统常清。咸丰元年，青州副都统常青；咸丰十年，青州副都统恩夔。同治元年，青州副都统恩夔；同治四年，青州副都统恩夔。光

^[1]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十三，志五十八，礼二（吉礼二）岳镇海渎，二十六史，2233页。

^[2]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十三，志五十七，礼二（吉礼二）岳镇海渎，二十六史，2216页。

^[3]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十三，志五十八，礼二（吉礼二）岳镇海渎，二十六史，2238页。

绪元年，青州副都统春福。^[1]

根据东镇庙现存的碑刻，清光绪《临朐县志》的上述说法大多可以得到证实，但统计并不完备，多有遗漏。据吉星田《东镇庙碑目》记载，还有以下多次遣使祭祀活动没有在清光绪《临朐县志》中记载：顺治三年（1690年）李蕊、顺治十年（1653年）李森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王日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李振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李振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瓦尔大、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朱汝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陈大受、嘉庆五年（1800年）赓音布、嘉庆十七年（1812年）李文耕、咸丰十一年（1861年）刘景叔、同治元年（1862年）陈士杰、光绪五年（1879年）张曜、光绪十年（1884年）姚延福、宣统三年（1911年）曾硕儒。由以上资料可知，清朝历代皇帝致祭沂山次数为：顺治4次、康熙10次、雍正2次、乾隆8次、嘉庆4次、道光3次、咸丰3次、同治3次、光绪3次、宣统1次，总体致祭次数较明朝有所减少，但官员的级别较高，这说明清代对沂山还是非常重视的。

同时清代地方官员也因故频繁的对沂山进行祭祀，东镇庙现存清代官员自发祭祀的碑刻就有9幢之多。而且清代对于东镇庙也进行了多次的重修，但与明朝相比，重修的次数有所减少，仅有3次，重修的规模也较明朝有所不及。

到民国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乱和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家对东镇沂山的祭祀废止，仅有当地百姓到沂山祈福。现存东镇庙碑林有两幢民国时期的碑刻，皆为当地乡绅募集善款修缮沂山庙宇的记载，分别是：民国二十四年《重修泰山行宫记碑》；民国二十九年《重修寝殿记碑》。另据民国《临朐续志》卷六《寺庙》记载：“沂山，在县治南九十里，南北绵延……民国十年以还，土匪起，往往以此为窟穴，巖壑邃密，搜剿为难”^[2]，此时沂山竟然沦为土匪等的巢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沂山当时的破败情况。

至于清代和民国时期，民间信仰的发展情况也受明代影响很大。此时，“东镇老爷”依然是周边百姓祈求福祉、消灾解难的重要依靠，东镇庙会也依然非常兴盛，只是较明朝相比规模要小一些。而沂山佛道两教在明代之后的发展可谓是相差很大，据赵卫东教授《沂山东镇庙及其宗派传承》一文可知：“清代东镇庙是有邱祖又派与华山派混住，且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而且两派轮流住持东镇庙”。而佛教此时仅有法云寺一座孤庙，且少有僧人。

建国后，移风易俗成为社会主流，东镇庙及东镇庙碑林等历史文物几度遭到毁坏，逐渐没落。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临朐县政府实施突破沂山战略，重启了重修东镇庙的步伐。

^[1]《临朐县旧志续编》之《光绪临朐县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165页。

^[2]《临朐县志》，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3年11月第一版，23页。

2009 年开始，经历了对东大门、接官亭等景点的重建后，历时三载，重修过的东镇庙呈现在世人眼前。此次重建由临朐县政府出资一亿五千万，社会各界捐款八百万，于东镇庙原址进行扩建。扩建后的东镇庙占地六万三千平米，建筑面积一万多平米，分为东、中、西三院。中院为山门、钟鼓楼、护法殿、东安王殿、寝宫、斗母宫、文昌殿、财神殿、东西碑廊、东西环廊等建筑，完整的留存了院内的汉柏、唐槐、元银杏、古碑、宋式古祭台、大殿古遗址等历史遗存。东跨院新建药王殿、紫薇宫二处。西跨院新建东镇文化陈列馆、道舍。并立有《重修东镇沂山庙记》碑。

沂山庙会等节庆民俗活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下也得以复兴。近年来，在临朐县政府和沂山管委会的推动下，在继承传统礼仪和民俗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沂山祭山大典、东镇庙庙会、槐花节等文化品牌活动。以东镇庙庙会为例，除了原有的祭祀和贸易特色，近年来更多被赋予了旅游观光的性质。总体而言这些活动民俗特色浓郁，不仅具有极高的传统文化价值，还具有互动参与性，因此吸引着潍坊、临沂乃至省内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逐步成为鲁中地区全民性节庆活动，适应新时代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发展需要。

明代对沂山信仰的重视，在清代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得以继续推行，但是在规模和重视程度上较明朝有所不及。但随着清王朝自身政治、经济的衰败、外敌入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沂山官方信仰和祭祀在清王朝后段和民国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当地民众还把沂山神作为祈求福祉、消灾解难的最后稻草才加以崇拜。到新中国建立后，沂山得以重建，东镇庙、碑林、东镇庙会也逐渐兴盛，沂山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为当地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结语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岳镇海渚祭祀一直是国家祭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镇山祭祀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两千四百多年的王朝进程中，我国的镇山格局历经了从多镇山到四镇山到最终确立五大镇山的转变。但是不管如何改动，东镇沂山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牢牢地占据镇山祭祀之首位。起初，黄帝在祭拜泰山时封沂山为东泰山禅丸山，舜肇定十二州后封山，又定沂山为青州重镇，此后夏、商、周代代相祭，秦祀更加车乘遥驹，到西汉太初年间，汉武帝东行泰山之时，莅临此地建立祠并种植柏树致祭，魏文帝时期沉埋圭璋于此，直至开皇十四年，隋文帝下诏册封东镇沂山立祠并安排人主洒扫一事，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册封东镇沂山为东安公镇守东方，宋代徽宗又加封它为东安王，其权威到达鼎盛状态。后来朱元璋登基后，下令去除全国的各路神灵封号，只保留其神位，因此沂山称神。清雍正年间又加封其为佑民捍御之神。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共十朝十六位皇帝曾经封禅沂山，他们的到来赋予东镇沂山浓厚的历史人文色彩。

明代，国家对镇山的祭祀达到了鼎盛，这种镇山祭祀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威信和正统，也宣示着对地方的控制。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封东镇沂山之神，取缔淫祀，把镇山的祭祀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明人王居易《东镇沂山志》中所辑录的官方性祭祀就有八十余次。对于明朝历代帝王而言，东镇沂山之神首先是功能之神。皇家用祭文赞美沂山之神，这种取悦是极具功利性的。因为沂山之神是帝王与上天沟通的媒介，是帝王的使者，他将帝王的诉求传达给上天，从而达到赢得战争、消除自然灾害或者祈求福祉的目的。其背后传达出的讯息则意味着皇权对神权的控制。另一方面，沂山神又是仪式之神。国家通过举行一系列的祭祀仪轨从而使民众产生一种体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宣示着皇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宣示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普通的人的控制。

于民间，由于国家控制淫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沂山神信仰在民间的传播，但是透过一系列的民间传说、东镇行祠的建立以及有关东镇庙会的记载，还是可以窥视一二。明代曾多次对东镇沂山庙进行修葺，其中多有民间经济力量的加入，此外，由于路途遥远，安丘、昌乐等地民众自发修建东镇行祠以祀神。这充分凸显出东镇沂山神虽然披着政治权力的外衣，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已经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并信任，成为当地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东镇沂山神是国家有目的的造就的神灵，但是也同时经受了其它各方信仰力量如道教、佛教等信仰的渗透和参与。尤其是道教，它不仅使得沂山之神具象化并进入庙堂，

成为形象的信仰个体，并且历代一直掌控着东镇庙的管理事务，对于东镇沂山信仰在国家祭祀中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总之，明代东镇沂山的信仰是糅合了国家对官方祭祀的控制与民间信仰崇拜和其它信仰势力渗透的产物，是镇山信仰在整个古代历史中的一个缩影，这对于我们研究相关的山神信仰和山神祭祀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古籍

-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 (东汉)班固撰:《汉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
-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
- (唐)魏征等撰:《隋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
- (元)脱脱等撰:《金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
- (元)脱脱等撰:《辽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
-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4年。
- (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5年。
-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5年影印本。
- (清)张敦仁编修:《临朐编年录》,潍坊新闻出版社,2003年。
- (宋)欧阳修撰:《太常因革礼》,中华书局,1985年。
- (明)王居易:《东镇沂山志》,潍坊新闻出版社,2003年。
- (明)傅国:《昌国榦》,潍坊新闻出版社,2003年。
-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 (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

(明)方达宜撰:嘉靖《山东通志》,嘉靖二年(1523年)刻本。

(明)王家士等修:嘉靖《临朐县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刻本。

(明)雷礼撰:嘉靖《青州府志》,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刻本。

(清)姚廷福修:光绪《临朐县志》,光绪十年(1884年)刊本。

(清)张印立等修:康熙《临朐县志》,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本。

(清)高居广修:光绪《临朐乡土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

政协临朐县委员会编:《临朐县旧志汇编》,潍坊市新闻出版局,2002年。

2. 今人著作

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

郑振满、陈春生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朱海滨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马西沙等著:《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何平之著:《崇山理念与中国文化》,齐鲁书社,2001年。

齐涛主编:《中国民俗通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东卷》,中华书局,2013年。

张孝友、李淑燕、宫德杰著:《东镇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

赵卫东、宫德杰著:《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齐鲁书社,2011年。

潘心德著:《东镇沂山》,济南出版社,1998年。

3. 学术论文

顾颉刚:《四岳与五岳》,《顾颉刚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 谢景泉：《医巫闾山名称考释》，《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版。
- 齐仁达：《明清北岳祭祀地点转移之动态考察》，《史学月刊》，2009年。
-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 秦永洲：《古代山东地区的祈雨风俗考述》，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年4月。
- 李绍强、李修龄：《论明清时期山东民间信仰对的特点》，《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8卷第1期。
- 刘慧：《泰山祭祀及其宗教特征》，《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 张海霞：《先秦时期山岳崇拜初探》，湘潭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5月。
- 任培育：《明代民间信仰研究》，河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4月。
- 南炳文：《消极与积极并存：明朝建国前后祭祀活动论述》，《求是学刊》，2011年1月第38卷第1期。
- 赵树国：《明清鲁中民间信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致谢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转瞬即逝。即将毕业，回首过往，感慨万千。

在论文即将定稿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燕生东教授，不论是从论文的定题、材料的搜集、写作方法、构思技巧，还是论文的修改，都凝聚着燕老师的大量心血。我本是英语专科出身，底子薄、基础差，对本专业的认识不足。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燕老师给了我许多指导，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燕老师渊博的知识、扎实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做人态度，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体味。回首与导师相处的时光，心中充满了幸福与感动。再次对我最敬爱的导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在此我还要对王志民老师、程奇立老师、仝晰刚老师、李梅训老师、刘爱敏老师、张磊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诸位老师给予我学习和生活上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 2012 级的同窗益友高凯、申继鑫、李健、于海元、孟莉、王超等在三年研究生涯里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三年的相处充满欢声笑语，令人难忘。感谢师哥甲宗杰、王贵涛，师姐陈晓、时孟，师弟王晓、马建伟等，给我的研究生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再次向齐鲁文化研究院的老师、同学、朋友们送上我最诚挚的谢意。

郭明明

2015 年 3 月